人居三、中等发展陷阱的本质与我国后中等发展期规划改革：再论整体主义

Habitat III, Nature of the Middle Development Trap and Chinese Planning Reform in Post-middle-development Period: The Second Essay on Holism

王红扬

Wang Hongyang

摘要: 解读人居三, 以《新城市议程》和《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为例, 剖析其中潜藏着“规划包罗一切”的危险。该倾向似乎具有逻辑必然性, 论文论证其背后是先验、确定、局部、线性的世界观。进而, 以一个“认知形成”原型引领, 系统阐述以关系、一致性、可变、同时性逻辑、整体等为核心的认知与事物演化的真正本质。两种世界观的对比, 澄清了包罗一切式解决方案普遍发生但无效的原因, 其与中等发展陷阱的关联, 以及突破中等发展陷阱的原理等, 最终应用于对中国式中等发展及助力突破中国式中等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与规划改革的讨论。本文以建构整体主义为核心理论诉求, 本身也是该理论的一次实践。

Abstract: The essay starts with Habitat III, the newest milestone of global planning. It examines its two core documents, New Urban Agenda and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n Urban and Territorial Planning, analyzing there is an underlying issue of “planning becomes everything”. It then demonstrates that beyond the “everything” issue there is the orthodox philosophy viewing the world comprised by *a priori* exact parts and linear logic. In contrast to the orthodox philosophy, guided by a prototype how human recognition of the world is formed, the essay then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a new philosophy of Holism, with relation, conformity, changeableness, synchronic logic and whole among its core ingredients. Based on this theory, the problematic nature of “everything”, the nature of Middle Development Tra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ecome clear. The rationale to break the MDT is also illuminated. These implications are finally applied to a discussion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Middle Development and the Chinese New Urbanization and planning reform to help break the Chinese Middle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Theory of Holism is the main theoretical purpose of the essay, with itself being a holistic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关键词: 整体主义; 中等发展陷阱; 人居三; 规划改革; 新型城镇化; 本体论; 认识论; 方法论

Keywords: Holism; Middle Development Trap; Habitat III; Planning Reform; Chinese New Urbanization;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作者: 王红扬, 博士,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中法城市·区域·规划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1 研究问题与方法

1.1 当下中国现实困局的复杂本质与整体主义的提出

不必讳言, 当下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与困惑, 是发展似乎正在进入某种难以突破的瓶颈状态, 即使顶层拥有前所未见的雄才大略、坚定决心和大刀阔斧, 很多方面依然存在改革推不动、方向看不清的现象^[1]。这个瓶颈一般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但这个来自经济学的新概念, 误导人们将其视为一个当代、经济学的事物。但显然, “中等收入陷阱”仅表达了该事物在经济学角度的某个方面的结果性现象特征, 这个现象源自何种机制、这种机制是否当代才有, 这些问题才指向该瓶颈的本质。实际上, “到达一定水平后停滞不前”, 不仅在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全球具有一定普遍性, 也是空间发展、思维成长、个体进步等各方面都时常出现的一种状态; 这种更广泛的普遍性还提醒我们, 它其实是一个早已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事物。由此, 笔者认为对它的更恰当称谓是“中等发展陷阱”或简称“中等发展”, 这是一个超越了具体部门内涵、首先代表着某种机制的事物。“中等发展”何以会在发展之“轨迹”上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难以挣脱的拐点式存在? 这启示了重要的科学问题。

但在很多学者或精英眼里, 也包括在政府的文件中, 似乎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都清晰简明。笔者在《整体主义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评〈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2]（下称《评〈为增长而规划〉》）一文中指出, 以理论家首当其冲, 人们误解和低估了现实困局的本质与复杂性; 而整体主义则是笔者试图建构的理论, 一方面解释事物的本质与复杂性, 另一方面启示问题的正确解决方向。

然而, 由于该文是对整体主义的第一次较完整阐述, 直接主题并非理论本身, 同时事物的整体性因其基础和朴素的性质容易被忽略,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理解理论及文

中对实践解决的阐述。本文从有所差别的角度进一步阐述理论并发展完善，同时更直接地应用理论回应现实问题。

1.2 对人居三的整体主义解读

2016年，在城镇化与规划领域发生的一个大事件——人居三，同样深刻潜藏着整体主义的挑战。为此，基于该事件自身的重要性，以及作为阐述整体主义的一个重要现实案例，人居三被纳入本文框架。笔者作为人居三核心文件之一——联合国人居署《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n Urban and Territorial Planning, 下称《准则》)的起草特别专家组成员，参与了会议及前后一些活动，包括人居署“《准则》的中国本地化”会议。

另一方面，如果整体主义揭示了存在、认知和干预的本质规律，那么要正确解读人居三，在方法上也逃不脱整体主义的框架。比如，通常意义上的“客观”介绍和解读并不存在，任何解读都包含着对该事件事实上无穷的要素的主观“裁剪”，裁剪时包含了主观对意义的判断和选择；事件本身也没有先验属性，比如人居三一定代表着更先进的对规划的理解吗？不一定；所形成的任何判断都相关于评价的“标准”或“参照系”，后者同样并非先验，知识建构归根到底要尽可能穷尽地“猜想”“对象”的潜在“意义”，然后在其中基于同时性逻辑构建出相对最有价值的“一致性”意义体系（包括对于笔者而言，人居三只有与中国现实问题有效关联起来才有意义）……

1.3 行文的逻辑

但因为本文是建构整体主义的努力的一部分，该理论是在最基础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次对现有认识的颠覆，所以文章的推进既不是基于现有理论，也还无法直接以整体主义理论作为起点。在这种情况下，与《评〈为增长而规划〉》一样，行文试图基于最朴素的逻辑，步步推进。

2 2016——全球规划大年，凸显中国规划缺少深刻反思与变革？

这两年，很多规划师担心中国会不会进入规划的“小年”。但就全球而言，2016堪称一个规划大年，标志性事件就是人居三——“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ousing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于10月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召开。人居峰会每20年召开一次，1976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第一次峰会催生了联合国人居署，也是唯一一个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的

联合国主要机构。“规划大年”当然不是仅由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和全球多国首脑、各方面各层次利益相关者据称多达4.5万人参加的全球性会议的召开来判定，更因为会议内容表明，一定程度上全球对规划在发展中所扮演的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达成了共识，规划自身的创新发展也以这次会议的核心文件为标志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大会最核心的两份文件当属《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 下称《议程》)^[1]和《准则》。《议程》在开头提出，人类面临的挑战，“需要抓住城镇化带来的机遇”来解决（第4条）；解决的路径，首先就是规划：

通过重新定义规划、设计、投资、发展、治理和管理城市与人类住区的方法，《新城市议程》将帮助结束一切形式和维度的贫困与饥饿，减少不平等，促进可维持、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性别平等和为所有妇女、女孩注入能力以充分发挥她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贡献，提升人类健康与福利，促进韧性并保护环境。（第5条）

整部《议程》共175条，出现“plan”或“planning”超过70次。

在人居三会议之前已获得人居署理事会通过的《准则》，或许可以称为城市与区域规划第一个真正的国际性法规，它不同于之前出现过的由行业协会制定的专业技术标准。《议程》与《准则》在核心思路高度一致，只是前者更多是作为目标、任务和承诺的宣示，后者则提供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工具、手段和行动模式。《准则》的文本可以反映人居三对规划的重新定义：

城市与区域规划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决策过程，它通过制定各种空间愿景、战略和规划，应用一系列政策原则、工具、体制性和参与机制、管治程序，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目标……城市与区域规划不只是一项技术工具，而是一个协调竞争性利益的综合性、参与式决策过程，该过程与共同愿景、总体发展战略和各项国家、区域和地方城市政策相衔接……是城市治理新范式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可以促进地方民主、参与度、包容性、透明度以及对责任的承担，以期确保可持续的城镇化和空间的质量。^{[4] ①}

上述对规划的定义与今天中国实践中的城市与区域规划显然有很大的差别。实际上，人居峰会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城镇化和规划的全球性行动或运动，人居三则标志着城镇化和规划全球性行动40年。40年中，规划在全球经历了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规划专业的、工程技术的、专家主导的蓝图导向式物质空间规划，首先遭遇了针对综合理性规划的批判的冲击，以及过程式规划、渐进式规划、倡导性规划

① 本文涉及《新城市议程》和《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均以英文版本为基准。

等的挑战；进而，对于空间及其机制的理解，在“集中”方向上，受到由新的交通和通信网络技术支持的文化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密集城市化空间及其功能与“权力”持续扩张的冲击（如大都市区、城市群、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社会等）；同时，在“分散”方向上，首先是从全球范围而言，更加自觉的、以个体为基础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角度产生的对全球化和“集中”的激烈反抗，结合经济方面后工业化特征的出现，导致在总体社会思潮、发展战略，进而是空间与规划方面出现更强烈的平等、多中心、分权、地方化、沟通转向和治理（governance）等转型诉求；此外，还叠加了对环境问题以及这一维度上持续发展出现的气候变化、低碳、韧性（resilience）等问题的关注，以及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主要从规划实践和技术角度不断产生的诸如 TOD、新城市主义、紧凑城市、精明增长、智慧城市、空间规划（spatial planning）等等概念和理念。所有这些，决定了全球层面的规划早已发生巨变。无独有偶，2015 年是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SOCARP）成立 50 周年，其年会的主题是“城市拯救世界，让我们重新发明规划”（Cities Save the World, Let's Reinvent Planning）。在这些背景下，2016 的人居三堪称全球规划改革创新的一次集大成。

规划改革创新的大年，应该同样适用于中国。十八大以来，国家正在坚定深化改革，在规划领域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2015 年 12 月召开了继 1978 年之后的第二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前则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2016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主题是“60 年：成就与展望”（中国规划学会成立 60 周年）。实际上，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快要 40 年了，这还意味着一定意义上中国其实赶上了城镇化和规划全球行动的潮流。那么，中国规划的改革创新如何？

这个问题显然很难回答，但这里尝试给出一个“客观”视角：看一看我们的规划法。正在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下称《城乡规划法》）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这是十八大之前的法律，即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充分意识到新常态之前的法律，是不是应该考虑修改？更有意义的，是对比一下《城乡规划法》与它的前身——1990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下称《城市规划法》）和 1984 年 1 月 5 日公布施行的《城市规划条例》（下称《条例》），看一看中国规划的“基本法”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接近（2008 年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是不是有了深刻变革。什么是“深刻变革”同样很容易有争议，但三个文本的对比还是可以确定地给出大量信息。

一方面，以 2008 年的《城乡规划法》回溯，可以发现：

- 在规划体系上明确了城镇体系规划，增加了控制性详

细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

- 增加了强制性内容；
- 强化了公众参与；
- 确立了“一书两证”制度，并通过明确规划管理和编制的法律责任强化了规划的法定性；
- 去除了有关城市规模划分以及相关的城市化方针的内容。

但另一方面，以 1984 年的《条例》对比后两部，可以发现《条例》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城镇体系”“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正确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建设用地许可证”和“建设许可证”等内容，其中“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正确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在 1990 年的《城市规划法》中被去掉了。三部法在体例上基本一样，但是有很多细微逻辑和语言上的调整，以及 1990《城市规划法》中的“城市新区开发与旧区改建”一章在 2008《城乡规划法》中被整合进了“城乡规划的实施”章节等。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经过翻天覆地的 20 多年后，除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很少的全新内容，规划法仅是在第一版的框架内做了一些通常被称为“修改完善”的工作？

这些修改完善中还有一些颇值得关注，比如 1984 年《条例》的第一条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本条例”，之后都被改成了“为了（达成城市规划的目标）制定本法”（括号中文字为作者归纳，法律原文较长）；《条例》和《城市规划法》中都写明详细规划是针对“城市近期建设区域内”，但在《城乡规划法》中消失了；既有城市规模划分又有城市化方针的，只有 1990 年的《城市规划法》，但恰恰现实中，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政策始终与城市规模高度相关，2014 年还专门重新定义了城市划分标准。定性地看，人们会说 2008 年《城乡规划法》在城市规划转型城乡规划、体现规划的公共政策性以及提升规划的法定性等方面有所突破^[5-7]，但基于文本的“客观”对比分析，以上评价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支撑。对比人居三重新定义的规划，下面这段针对 1990 年《城市规划法》的评论似乎仍然适用于今天的《城乡规划法》：

通常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种对 1990 年《城市规划法》的批评……规定了大量的技术问题，像是城市规划原理的翻版。现行《城市规划法》基本上表达了计划经济时期对于“城市规划”的理解，反映了文革后期特别是 1980 年代以来规划“技术革新”的道路，以及所创立的规划制度的基本内容。^[8]

实践中规划师常常抱怨的是具体技术上的缺乏变革，比如总体规划几十年不变、死搬教条，背后其实有编制办法、审批办法的问题，而所有这些后面，还有规划法的局限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努力地工作，有可能只是努力让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把自己捆得越来越死，以及制定出越来越多不合理的条条框框。问题的复杂性呈现了出来。

但这样的缺乏创新只是立法者、管理部门的责任吗？对于规划学科而言，在没有完善之前，本领域的基本法大概应该是一门显学吧；并且如果规划法就是要对规划技术作规定，那么规划技术本身是否存在重大学术问题，该如何解决？这些方面，理论研究显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努力。一些概念，如规划的公共政策性，有学者^[9]实际上强有力地质疑了这一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因为“公共政策”、“法”、“科学技术”三者公正还是效率、服从政府还是技术标准、强烈的稳定性还是灵活性等方面本身就是矛盾的，但在实践中，口头上依然大行其道。问题的复杂性进一步呈现了出来。

但是，我们一定要跟上国际规划改革的潮流吗？显然，并不是为改而改，而要问改了对不对，这涉及什么是对乃至什么是真理——问题更加复杂了。

3 规划在拯救世界吗？人居三隐含的悖论

全球规划的变革是否成功，又是一个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我们要再次给出一个尽可能靠近“客观”的视角——设定这样一个问题：人居40年，就全球而言，城镇化发展问题、城市病问题是否越来越得到妥善解决？这是一个可以间接反映规划变革效果的总体现象。虽然不可能百分之百严密回答，但是相信很多人会同意，如果排除中国，总体来看，很难认为40年来全球城镇化发展和城市病治理取得了很大进展。或许人们可以辩称，这不意味着规划的失败，而是其他因素导致了好的规划没有得到好的实施，比如制度因素等等。这也正是规划师经常在中国说的。但全球范围，可能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学习西方，所以制度因素似乎不该成为借口。值得深思的，恰恰在于即便有所谓共同的制度乃至价值观，就一般发展而言，全球的总体南北版图没有大的变化——除了中国等极少数国家。

为什么全球规划变革似乎没有对现实产生理想的效果？

表1给出了《议程》和《准则》的内容目录。其中，《准则》的A、B、C、D每个子目录下，体例均为：“原则”、“国家政府，协同其他政府主体、相关合作伙伴，应当”、“地方政府，协同其他政府主体、相关合作伙伴，应当”、“民间社会组织及其协会应当”以及“规划专业人员及其协会应当”。可以看出，两份文件：

- 既有目标，更有广泛系统的行动建议，包括实施规划以及后续行动与监测；

- 在目标中，传统意义的空间目标几乎看不出来，而是围绕着可持续发展概念框架下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

发展（请注意这里的顺序是社会、经济、生态）；

- 在行动与实施方面，既有传统规划内容，更有系统、具体针对各级政府、社会、专业人员等所有相关主体的政策、财政、专业技术等各方面相关工作的行动建议，为每一方都提出了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按照人居三，“城市规划”四个字基本可以被“城市治理”所替代。

让我们多看一点，以下内容选自《新城市议程》中“向可持续城市发展转型的承诺”部分。在“社会包容与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章节：

26. 我们承诺致力于这样的城乡发展：以人为中心、保护我们的星球、关爱所有年龄和性别人们的需求、保障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促进共同生存、终结一切形式的歧视与暴力，并在让所有个体与群体都能实现全面而实质性的参与的同时赋予他们以能力。我们进一步承诺致力于促进文化、促进对多样性和平等的尊重，它们是我们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的人文性的核心要素。

在“为所有人带来可持续与包容的城市财富与机会”章节：

49. 我们承诺支持这样的区域系统：将城市与乡村的功能整合进国家和区域空间框架以及城市与人类住区体系中，以促进对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可持续管理和利用，确保连通城乡供应和需求的可靠的供应与价值链，以培育跨越城乡空间连续体的均衡的区域发展，弥合社会、经济和区域落差。

50. 我们承诺，依托秉持城市与区域整体观的规划手段的支持，通过强化可持续的交通与流动，以及技术、通信网络与基础设施，鼓励城乡交互与联系，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相

表1 《新城市议程》和《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的内容目录

《新城市议程》	《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
基多宣言：致力于为所有人带来可持续的城市与人类住区	I. 背景
我们共同的愿景	A. 目标
我们的原则与承诺	B. 定义与范畴
对行动的呼吁	C. 制定背景与原理
《新城市议程》基多实施规划	D. 制定过程
向可持续城市发展转型的承诺	II. 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
社会包容与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城市发展	A. 城市政策与治理
为所有人带来可持续与包容的城市财富与机会	B.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与区域规划
环境可持续与韧性的城市发展	B1. 城市与区域规划与社会发展
有效实施	B2. 城市与区域规划与可持续经济增长
建立城市治理结构：构建一个支持框架	B3. 城市与区域规划与环境
规划与管理城市空间发展	C. 城市与区域规划要素
实施手段	D. 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实施与监测
后续行动与评估	

关方面的生产潜力，社会、经济与地域的融合，以及安全与环境的可持续性。这类联系可能包括在城市与它们的周边区域之间、城市边缘区域与农村地区之间以及更大尺度的海—陆之间。

51. 我们承诺促进城市空间框架的发展（包括基于因地制宜的填充或规划的城市扩张战略，支持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与土地的管理与利用、合理的紧凑度和密度、多中心和混合利用的各种规划与设计），以激活经济的规模与集聚效应，加强食品系统的规划，进而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城市的韧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显然，我们看到理论和实践的很多创新被整合了进来，不同学科、专业的界限也被完全打破。

这样的目标、这样的规划精彩吗？很精彩。那么，是不是这样的思路和规划仅仅到了“人居三”方成型，还未来得及付诸于改变现实？我们来回首一下“人居一”，核心文件是《温哥华宣言》^[10]和《温哥华行动规划》^[11]。前者包括：I. 机遇与解决；II. 总原则；III. 行动指引。后者包括：A. 住区政策与战略；B. 住区规划；C. 居所、基础设施与服务；D. 土地；E. 公共参与；F. 体制与管理。更多的细节，我们选取“III. 行动指引”中的头几条：

2. 政府有责任制定空间发展规划和采取人类住区政策以引导社会经济发展行为。这些政策必须是一个总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关联并协调于工业化、农业、社会福利和环境与文化保护方面的政策，彼此互为支持以实现所有人的福利的逐步提升。

3. 人类住区政策必须寻求一系列因素之间的和谐整合或协同，比如人口增长与分布、就业、居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与服务。政府必须创造各种机制和体制以制定和实施这样一个政策。

4. 将改善农村聚落置于国家和国际努力的优先位置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应当尽力缩减乡村与城市地区之间的差距，类似地应缩减区域与区域之间以及城市地区内部的差异，以实现人类住区的和谐发展。

容易发现，人居一和人居三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前者显然还有更多典型传统城市规划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诸如重视行动、强调政策、整合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目标等等体现于人居三的特征已经非常清晰。也就是说，人居三所代表的城镇化干预与规划模式的变革，从人居一就已经开始了。然而，40年的实践后，效果显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为什么这么精彩的思想与规划没有能够如愿改造现实？我们再

次给出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的问题：人居三所定义的，真的还是规划吗？

我们一下子就能意识到，按照人居三，规划似乎成了万能的上帝，《议程》和《准则》的精髓，一言以蔽之，就是：所有人行动起来，运用所有手段，为所有人解决所有问题！规划真正变成了威尔达夫斯基（Wildavsky）所说的包罗一切或者说范畴无限扩大化^[12]！这样的事物存在吗？这样的理想可行吗？如果规划是这样的，还要那么多其他部门干什么？进而，这样的努力在知识上可行吗？

但是更复杂的问题是：规划难道不是的确应该如此吗？问题的关联决定了人居三的每一点似乎都无比正确，而且无疑是到达了很高难度的复杂性的正确。作为我国唯一参与了人居三两份文件编制的专家，石楠秘书长评价《新城市议程》是“技术逻辑向政治逻辑的突破、城市要素向城市系统的迈进、单一部门努力向联合国大家庭的跨越、被动应对向主动解决的突破、单一价值向多元合作的进展”^[13]。姑且不论评价是否准确，但至少这些拓展似乎都是正确的。现实中我们的政策、规划，同样明显存在着内容越来越多、范畴越来越广、越来越包罗一切的感觉。可是，如果真是这样，“专业”的合理性又在哪里，“专”不就意味着没有把握住整个事物吗？这进一步提醒我们问题的复杂性，也启示我们应该对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有所理解而不是简单批评，进而思考正确的解决究竟是什么。

现在，我们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状态：对于走向范畴无限化的规划，在对立的正反两方面我们都拥有似乎正确的逻辑——康德所谓二律背反^[14]。只是，两方面的逻辑都还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实际上，威尔达夫斯基的《如果规划什么都是，它就可能什么都不是》^①（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一文，主题其实正是——在逻辑上，规划似乎无法逃脱要变得包罗一切，包括要变成“对未来的控制”“原因”“权力”“适应”“过程”“意图”“理性”，在每个下面又要变成很多其他东西，如在“理性”下面规划要变成“系统的”“效率的”“协作的”“一致的”“有弹性的”等等。他的证伪也都只有间接证据，这应该才是他使用疑问句式标题的原因。换言之，尽管透彻理解了规划的内在矛盾，但他并未能真正找到解决之法。

人居三所隐含的具有普遍性的解决方案的范畴持续扩大化的倾向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导致如此普遍的现实，无视人们付出的巨大努力而像陷落在某种泥潭中一样不再前进？而另一方面，如果存在问题，既然各国普遍都在这同样的知识

① 整体主义中所涉及的“整体”或广义的“全部”、“局部”、“零”，可以方便地对应于英文的 everything、something 和 nothing，但为了更好地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会结合具体的上下文灵活表达，如 everything 可能表达为“包罗一切”、“范畴无限化”等，nothing 可能表达为“什么都不是”、“别无其他”等。

与政策演进的脉络中，为什么发达国家仍然实现了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直到新常态之前中国似乎也一直在突飞猛进，直到最近才越来越感受到了中等发展陷阱的威胁？我们需要找到更直接的逻辑证明。

4 包罗一切倾向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内核与整体主义

4.1 包罗一切的内在冲突性

“包罗一切”之所以不仅在规划领域，也在很多其他方面同时发生着，当然是因为这一逻辑本身看起来毫无问题。但我们的第一个直接逻辑证明正是来自于对这一点的挑战：它们看似毫无漏洞，实际却是一类充满了内在冲突性，进而意义游移、不具严密性的命题。我们回看这一条：

26. 我们承诺致力于这样的城乡发展：以人为中心、保护我们的星球、关爱所有年龄和性别人们的需求、保障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促进共同生存、终结一切形式的歧视与暴力，并在让所有个体与群体都能实现全面而实质性的参与的同时赋予他们以能力。我们进一步承诺致力于促进文化、促进对多样性和平等的尊重，它们是我们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的人文性的核心要素。

然而——

- 不存在无限资源、无限干预的可能。在有限资源（资金、智慧、时间等）前提下，投入于“人”与投入于“保护我们的星球”、关爱老人与关爱青壮年及儿童、保障一部分人的公平权与保障另一部分人对效率的需求等等，显然常常意味着冲突。

- 有人会争辩：本意并非如此，不是要让对人的投入损害对环境的投入；让一部分人的人权损害另一部分人的人权……如果是这样，那么上述表述的准确内涵究竟是什么？是否意味着这里的表述出现了不适当的以全称概念代替特称概念、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应当强调统筹协调？可是，诸如“度”、“统筹协调”等似乎中国智慧最擅长的概念，它们的确切内涵是什么？我们会发现，除非特定化，它们仍然是意义游移的，就像“不以损害下一代人的利益的方式实现当代人的发展”的实际内涵仍然不清晰，人们觉得这些表述正确，其实包含了自己对这些概念的特定化解读。但一旦特定化到有了确定指向，这个命题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具体规划了。

现实中很多类似的“无比正确的废话”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道德命题本质上一样，所以很多时候道德既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实现发展。

也就是，“包罗一切”似乎必然意味着内涵很多冲突和模糊，根本构不成一个有效确切命题。但提出“包罗一切”

的命题的人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在解决方案（如规划）的范畴被逐步扩大化的过程中，人们也没有看到这一点，否则，他们就没有理由继续这一过程或提出这样的命题。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4.2 先验、确定、局部、线性：逻辑原子主义的世界观

他们看到的，当然是上述命题中的每一局部点都是正确无疑的；然后，由于它们都是命题事物的一部分，所以将所有这些正确的局部加在一起，就得到了正确的“整体”。更精确地，就是人们认为，命题中的每一局部点是正确的，这种正确性独立于其他因素，独立于整个命题，然后正确的事物可以叠加在一起（得到正确的整体）。认为事物的性质、事物本身均为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独立的确定存在，在本文即称为先验的（这比一般哲学中将“先验”指为“不依赖于、先于经验的”更广义一些）。

对现实的一般观察可以发现，先验、确定、局部以及线性逻辑大致构成了常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形成了认知与改造世界的行为的关键特征：世界是由各种先验事物（首先是“客观”）构成，先验事物具有确定的属性，先验事物成为一个个局部，局部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事物的“全部”（人们以为这就是事物的整体）；对世界的认知，是逐步认知各种先验事物，进而由这些局部出发，叠加和线性推理（归纳和演绎）出事物的“整体”（“全部”）；改造世界，也就是把所有的局部做对并拼合到一起。这样的世界观直接导致了“包罗一切”的思维与行动，包括中国规划领域的缺乏深刻反思与变革，因为进步就像是一个线性的一步步累积的过程——先积累了一些正确局部，然后在保留过去的正确局部的同时再积累一些，直至越来越多。

上述世界观符合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早期所认为的逻辑原子主义^[15,16]，即事物是由最终不可再分的“原子”（这里指逻辑上的原子）一点点构成，对世界的正确认识由认知“原子”开始，通过归纳和演绎一步步理解了整个世界。克莱门特（Klement）暗示，逻辑原子主义正是罗素分析哲学的最基础逻辑——“分析”，顾名思义，分而析之。

但4.1让我们意识到：“正确”之间可能是冲突的，这意味着对冲突的彼此而言，任何一方其实不是独立的先验正确的，而也可能是错误的，其意义依赖于其身处的环境。常规的先验、确定、局部、线性逻辑的世界观错了吗？如果错了，错在哪里，为什么一直没有改正？

一般认为，原子主义的逻辑开始于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等。但朴素的逻辑可以推断出，这类世界观应该从人类文明的开始就形成了，因为认知的第一步，一定是从意识到具体的确定性开始的，然后是对这种

确定性的固化,进而由这些被固化了的确定性开始通过叠加、外推,最终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理解,即“局部→整体”。这是一个自然而简单明了的逻辑,看起来没有问题,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常规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仍然是先验、确定、局部、线性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没有深入到认知的内涵机制的逻辑。阻碍人们的思维深入下去的障碍,或许在于认知的内涵机制(我们将看到它也是我们的世界形成的机制)其实远比刚才解释的复杂得多。

4.3 认知事物形成的真正机制：一个原型

想象一个初生婴儿获得的对世界的第一“点”认知,比方说,在摇篮中手舞足蹈获得了“硬的感觉”。孩子是认知了“‘硬’的感觉”这个具体确定的事物吗?不是,是他/她的“意识”接收到了这样一组“感知”:在“无序混沌”中有“某种”“有序稳定”,那种有序稳定在这组感知中相对于处于意识的前端(就像意识“图底关系”中的“图”),但毫无疑问这组感知是同时出现在意识中的。这里的启示如下。

(1) 关系:他/她认知到的不是点,而是关系,即多个点以及它们的关联;而且不是一对关系,是一组关系;且每一个点也都是关系。比如他/她是在与“无序混沌”的对比下意识到了“有序稳定”;这个有序稳定的“特征”是对应于他/她的“感官”的“感知”的;“有序稳定”本身是感官至少两次(时间上有差别)感知到了一种一致(感官印象上无差别)……也就是,每一个意义都不是单独成立的,而是相对于某种与其构成关系的另外事物,关系改变意义也就可能改变,比如假设这个婴儿的感官此时还不能感知阻力,或者假设这是一个大脑中已经有了很多意识的大孩子,就很可能不会获得这里的“‘硬’的感觉”;或者假设婴儿只感受到了一次阻力,然后摇篮的边没有了,那么“这一次”根本不会被它/她感知到,而直接进入了这个孩子还没有意识到的沉沉的混沌无序中。

(2) 同时性:一方面,任何意义都是与关系中的其他意义依赖着成立的,而不是独立的。另一方面,归根到底,意义是在关系中同时被建立起来的,即互为依托而同时形成了不止一种意义,比如“无序混沌”其实是与“有序稳定”同时建立起来的一对意义,再比如,在婴儿的既有意识是一片混沌的背景下,某种感知至少两次出现,使这两次感知同时被感知到了。也就是,没有哪一方是另一方的前提,它们互为前提、同时确立。

(3) 主观:这个原型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各种意识和意识的结构,而没有“客观”。

(4) 不仅认知是关系,事物就是关系:上述原型中一切要素无论如何分割,都不可能得到非关系的独立事物。

(5) 整体、复杂性:这个简单的场景表明,人类的认知,从它的起点开始,就不仅不是某个客观的点,而且一点也不简单,而是一个多种意义(其中包括非常抽象的意义)基于多个关系而同时存在并同时获得各自意义的复杂整体。

也就是说,人类认知的起点就不是简单直接的先验、确定、局部和线性逻辑,而好像是某种关系、可变(关系相关)、整体、同时性逻辑。但人们仍然普遍实践着错误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是因为在很多时候,先验、确定、局部、线性思维似乎能够完美地解释一切。只不过,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完美”其实也并不彻底,而只是一种近似,只有接下来揭示的包含关系、可变、整体、同时性逻辑等内容的整体主义,才既能真正完美解释常规逻辑似乎适用的情况,也能解释其所不能解释的现象。相对于这里的原型,整体主义中还要加入意义—语言体系、人自身的积极性(如猜想、发展等因素)等,从而就更加复杂。

4.4 整体主义本体论

4.4.1 关系

事物是关系的,从而事物的性质存在可变性,或准确地说,是关系相关的。即,没有先验的对或错,不同的关系可能意味着“同一”事物的性质的改变。包括对、错在内,一切意义都是基于关系的属性;人们以为存在永恒的意义,是因为那些意义所依存的关系比较普遍,从而人们常常进入同样的关系,感受到同样的关联属性。所以,类似人居三把很多内容先验赋值为“对”的是错误的,而有的思维习惯把“资本”、“利益集团”等先验赋值为“丑恶”,同样是错误的。人们看不到一些看似无比正确的观点的错误,是因为人们没有看到或建立起证明那些观点是错误的的关系,比如,如果意识不到资源是有限的、投入一个方面会减少另一方面的投入,就不会意识到常见的理直气壮的“超前投资交通等基础设施”并不一定正确,而是包含着机会成本的。

4.4.2 关系与关系属性的复杂性

由于事物是关系的、事物的性质是相关于关系的,于是,一个事物常常是很多关系的集合体,容易想象这像一个复杂的关系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事物的某一个“局部”可能关联于多个关系,每个关系事实上为该局部带来了不同的性质。很多事物之间,同样构成这样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从而使得每个事物的性质由于其所关联的不同关系而呈现出复杂性乃至对立性,而不是“一是一、二是二”式的简单确定。

事物的关系的属性同样是多样的,而不仅仅是 $1+1=2$ 式的简单确定。还包括确定的多解、确定的“区间”(如区间内都是正解,但区间内却有无穷解)、确定的概率解、确定

不是什么但却不知道正解、确定的无确定解以及无法确定有没有确定性质等。比如，城市规划中的很多数字预测，一是预测本身就不能确切，二是那些数字对于发展的重要性也不一定确切。

关系和关系属性的复杂性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可能是复杂多样的，但我们常规的思维在先验化之后，进而倾向于把事物的性质理解为简单确定的，所以偏好于算术式的数字、简单明了的答案，实际常常是把本来复杂的事物错误地简单化了（正确的思维当然也在寻求简化，但那应是在准确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找到正确的简化认知和干预的方法）。

4.4.3 整体、整体性与事物演变的机制

事物的全部相关关系（包括其关系属性）构成了事物的整体。事物是整体的——事物即事物的整体。

事物的整体性是指事物的所有相关关系的总和效应与逻辑，这不同于事物的所有相关关系的“算术”叠加（即通常所谓“全部”）。通俗地说，整体性是指所有局部构成了怎样一个整体，如人体不光是各个器官，而关键是一些器官能够精巧地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支撑、成本最低、功效最大的有机整体，这种总和与逻辑与效应（所有局部的存在是其中一部分）是整体性。一个城市如果拥有了所有“部件”，但部件之间构不成一个有机整体反而互相冲突，那么在该城市生活拥有的就是各种空间与设施间非常不协调的整体性。

事物的功能维系于整体性而不是只要有了很多局部就可以。当然，由于每一个局部都是决定整体性的元素之一，而整体性则反过来影响着每一个局部，所以所有的局部（同时性逻辑地）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

事物的发展或进步是指“价值”正面的变化，而一切价值判断都是由局部立场/需求出发的，于是人们常以为价值判断（进而发展、进步）是见仁见智、没有统一标准的。但一方面局部的需求往往是多方面的，从而虽然由局部出发但却涉及整体；另一方面即使局部的需求是单方面的，但满足需求的功能却依赖于整体性。所以，价值判断、发展，最终也需要归结到整体性。社会发展，是由人的立场出发的社会整体性的优化。

事物的改变，机制是整体，动因是局部，局部通过衍生效应、整体效应影响事物。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干预只能从局部开始，但局部干预引起的局部的变化意味着全部相关关系、相互作用的调整，是这个整体性调整导致了事物的改变。假设，一座人行天桥的建设，畅通了一条街道的交通，人们常常以为道路畅通的原因是天桥，但实际上，是天桥、当地的交通总量刚好通过天桥疏解后就能够畅通、当地人愿意走天桥等因素整体配合的结果。所以，认为对局部

的干预只是在解决局部问题是错误的，如政府大包大揽扶持乡村环境改善，结果可能使乡村的社会文化也发生改变：不再崇尚自力更生而是转向依赖外部。现状中，由于不理解事物变化的真正机制是整体，所以人们过于重视局部，如对国外经验的借鉴总是试图快速地看到某个新鲜、具体的办法就“拿来主义”，而忽视那个经验是在别人的整体环境下才发挥作用的；又，以为政治机制、民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不知道它们也是局部。另一方面，如果忽略了动因始终是局部，就又会总是试图面面俱到的倾向，而不知道永远都是要通过局部撬动整体。很多情况下，看起来局部就是原因，只是因为整体的其他部分刚好配合，所以其他部分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的确，很多时候我们似乎不需要考虑得非常复杂，只需要做出某些局部改变，问题就解决了，但这没有改变机制还是整体。从而，如果不是想靠碰运气（整体的其他部分刚好配合）来解决问题——比如到了后中等发展期（4.5 将具体解释），靠碰运气成功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获得高成功率就必须靠对事物的整体机制的自觉。

正是基于这一原理，《评〈为增长而规划〉》一文指出，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实质是从一个具有显著整体效应的局部——政治经济，来解释整体因其而变，但因此将这一局部理解为事物的根本原因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原因仍然是整体。并且社会的具有显著整体效应的局部远远不止政治经济，以空间、人、文化等因素中的任一个为出发点，都可以得出对整体的解释。

局部的整体效应首先是哲学意义上的——局部是整体的一部分，任何局部的改变都意味着整体的改变；局部变化引起的具象的连锁效应是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局部的整体效应的具体表现。

4.4.4 事物是复杂的关系复合体，是不同属性的统一体，不同属性的事物存在被和谐统一的可能

事物是整体的，意味着事物是多重关系的复合体。这意味着事物的性质不仅是可变的，而且本身就是多种属性的统一体，而人们通常将事物误解为单一属性——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很多通常意义上不同乃至对立的属性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事物中，所以同一个事物可能是多侧面的，且这种多侧面很多看起来是“对立”的“统一”，但也包括很多其他的不同侧面。比如事物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既有简单的一面，又有复杂的一面；即是整体，又是局部；既有尺度的属性，又有位置的属性，还有结构的属性；等等。当然，“对立”、“冲突”、“统一”等其实是人的主观界定；对于事物本身，所有的属性都是自身的一部分。能够平和地接受事物是很多属性的“复合体”，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先验、确定性思维开

始向更高级的思维模式转型。但同时，又不能将各种属性混为一谈（结果就是“包罗一切”），而要能够让各种属性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即能够清晰地根据具体关系、具体整体来相应理解事物的性质。世界的一切属性都属于这个世界，这本身就是不同属性、不同事物统一于一体的最好例证。所以统一差别乃至对立事物常常是可能的，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找到、建构出实现统一的逻辑。如常规规划思维常常将一个地方的很多要素先验化为“坏”，而实际上是有可能将“坏”转化成“好”，更准确地说好的整体本就应是多样事物的适“度”混合、“匹配”（fit），而非各种“完美”事物的叠加。比如一部分落后的农村因为处于动态中，更合理的选择可能是较长时间不去干预，只需着重在畅通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路径和农村人口的基本保障两方面下功夫；再比如人类需要通过试错来学习，因此在并不是确切的“红线”的地方，要为社会留下自组织空间。

4.4.5 关系与整体的特定性

关系、整体总是特定的。认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将已知推广于未知，从而基本都是要把从一个特定关系（整体）中获得的知识应用到其他的关系（整体）中，因此，知识的应用几乎总是面对着新环境，所以需要高度自觉关系和整体的特定性，既有知识应视为对新环境的猜想。这也意味着，事物的属性、解决的方案，随时都可能（但并不是一定）需要调整，即使对于“同一个”事物——因为当下的河流其实已经相比原来的河流有了改变，原来适合的局部现在有可能已经不适合了。

4.4.6 同时性

事物具有同时性属性，事物的确定性最终源于同时性逻辑而非线性逻辑。

一方面，事物是关系的，从而我们看到的任一事物（包括事物的任一属性或局部）都是同时关联于其他事物而非独立，因此，正确认知事物，需要始终注意同时认知事物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规划师以为自己在客观看待一个城市，而实际上是他/她头脑中的观念站在他/她对城市看法的背后。

另一方面，非先验性之所以可能，人之所以不拥有任何先验事物而仍能拥有一个具有高度确定性的世界，是因为事物可以基于同时性逻辑得到确定：关系的双方同时确立彼此。我们对事物的一切认知——从而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事物的本体——全部建立于主观感知、知识、猜想之上，而并没有外在“客观”等任何先验事物的参与；其最终依据，是主观的同时性一致性，即感知的互为一致，此时是同一个性质及具备该性质的两个事物同时得到确立，这解决了线性逻辑所无法解决的“第一前提”问题。

现实中典型的的同时性事物比如：“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各方与整个关系同时得到确立的事物；“语言”，我们要寻找的语言，常常是与我们要寻找的“意义”在彼此靠近中同时获得的；“定义”（即“=”）是一个概念与概念的本体的同时性的彼此确立。但由于语言、符号的多义性，人们常常遇到的挑战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偷换概念”和“意义游移”，如整体主义在应用中的挑战之一，将是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关系、局部、整体，且在不同的场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而很容易出现错配。如所有事物和事物的一切特征都是某种“整体”，比如事物的表象有表象的整体，事物的机制有机制的整体，包含表象与机制的事物又是一种整体，我们认知事物有我们认知模式的整体，等等，人们很容易自己觉得已经掌握了整体概念，但实践中仍然是错配的。

4.4.7 事物的主观性、猜想性、确定性

人的主观中并不存在外在客观。我们的世界是主观的整体，外在客观是人为概念。但外在客观是一个从很多角度来看合理的假想。这个假想虽然可能造成误导，但也有很多有益的方面，其中之一是提醒人们，相对于真实的外在客观，我们的认知以及我们所掌握的事物性质始终具有猜想性（除非在人为建构的知识中），从而需要对知识保有谦卑而不是百分之百的自信。

事物本体的猜想性，还源于除了人为建构的知识，实际上人也无法穷尽认知“事物”（即主观感知可能）的整体。比如，规划中的“现状”是什么，实际上是无穷的。

事物本体的猜想性的第三点，是人对知识的运用，基本都是基于猜想。人能够确切的是主观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知；但人对知识的运用基本都意味着对特例（无论是“部分”还是“过去”）的趋势外推，如基于局部形成全称判断、基于过去和现在对未来进行判断（时间上的全称判断）。

非先验性、关系、基于主观认知和猜想性，是否意味着事物都是相对的和可以主观任意确定的，甚至现有法规、道德等都可以推翻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事物的性质确立于关系，因此在同样的关系与整体中，事物的性质是同样的。对于复杂的关系与整体，各种“局部”之间的相互制约，最终让事物反而有了更明确的规律性。也就是说，我们真正拥有的“客观”正是主观中的一致性，这个客观除了并不是“外在”的，在其他性质上其实与常规概念中的客观一样。其次，或许有人以为，由于事物的性质是关系相关的，那就可以随意跳出关系以改变事物的性质乃至否定事物，但关系、整体同样不是想跳就可以跳出来的，很多“普遍”原则之所以能够广泛存在，正是因为它们赖以存在的关系、整体的普遍存在。第三，即便关系、整体改变了，包括在原有

的关系、整体中，也存在错误认知了事物性质从而需要改变的情况，事物的性质也不一定得到改变，而取决于主观认知到的新的性质是否能够通过整体性检验（4.6 会有更详细阐述），在未能有效通过检验之前，原来的性质（认知）更容易保持下去，因为它会受到“习惯”所参与构筑的关系的支撑。这契合了库恩关于范式转换的理论^[17]。

4.5 整体主义方法论

为逻辑上更顺，这里“方法论”专指改造事物的方法，认识事物的方法放在 4.6，即本文“认识论”包含知识论和认知方法论。

4.5.1 不存在先验目标与行动

基于整体主义本体论，首先，改造事物不存在先验目标和先验行动，一切应根据特定关系、特定整体来决定。

4.5.2 正确的改造事物的目标与方法：最优整体性 + 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

由于事物的机制是整体，功能的本质是整体性，但动因却是局部，这里似乎再次形成了悖论。解决的方案其实很简单：由局部的整体效应“搭桥”，科学的改造事物的目标应是事物的“整体性的提升”或所能预见的“最优整体性”，科学的改造方法则应是“整体效应能够达致目标整体性的局部干预”，即“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Something of Everything，它认可了整体（包罗一切）具有必然性，但局部同样具有必然性，正确的解决方案既不是纯粹的整体，也不是纯粹的局部，而是整体与局部的统一。

局部与整体，可以体现在无穷多的属性上，包括时间上的短期与长期，也是一种局部与整体。

4.5.3 整体机制

整体机制是指事物全部要素的全部相互作用关系，包括各种相互作用之间的结构关系，如其中最核心的相互作用是什么（对应 4.6.4）。掌握整体机制才能更严密猜想最优整体性和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由于事物的复杂性，现状常常未能准确、完整理解事物的整体机制，比如城市规划中对城市发展结果（即规划“蓝图”）的形成机制，常常不去细致追究。

（1）往往不深入到“机制/行动→蓝图”思维，而只是“蓝图（理论或案例的）→蓝图”即基于理论蓝图或对标案例规划本地蓝图，或“蓝图（本地过去结果）→蓝图”即趋势外推，这两种常见思维其实是将真正的机制放进了“黑箱”。

（2）即便意识到了“机制/行动”，人们常常理解的是

“蓝图→机制/行动”，美其名曰目标导向。在不知道机制/行动是否可行之前，如何能够先行确定蓝图？这一逻辑实践中往往是（1）的延伸，即“宏观背景、政策、理论、案例→蓝图→机制/行动”的线性逻辑。

（3）显然，“机制/行动→蓝图”逻辑同样还不够好，这只是换了方向的线性逻辑；这里需要的是“机制/行动↔蓝图”——一个同时性逻辑的对双方同时进行猜想并彼此匹配的过程，目标是找到具备坚实“机制/行动”支撑的最优蓝图。

（4）显然，上述还完全没有涉及城市发展机制的更深入内涵，比如不仅有直接生产部门（如生产企业），而且有间接生产部门（如社会发展，最终决定了人力资本）；不仅有数量，而且有结构；不仅有“断面”，更有过程……

4.5.4 对最优整体性和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的穷尽猜想与检验

非先验性和关系、整体的特定性，决定了不能简单“拿来主义”地套用别人的理论目标与行动方案，而需要通过全新的对最优整体性和能够实现最优整体性的局部干预进行穷尽猜想和检验，最终找到最合理的方案。

由于最优整体性不是局部的算术叠加，而是局部之间能够构成怎样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在猜想时，对于最优整体性以及局部干预两方面，都应当高度关注结构，而不是一个个局部及其叠加。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不一定是干预具体局部，而可能是对结构的重组。

同时，“局部干预”中的“局部”，可以是一切“局部”，比如一个观念的改变。抛弃了先验观，就不会总是抱着某些干预模式不放，而能够非常灵活地根据整体情况确定最有利于整体的干预。

这个猜想和检验的过程中，整体机制将不仅是猜想目标和干预的灵感来源，也是检验的基本逻辑所在。

由于一般不可能穷尽事物的整体，包括穷尽事物内部的所有局部以及干预和目标的所有可能，因此最终找到的最优整体性和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往往是相对最优，即多方案比选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只有猜想出更好的方案，才能找到更好的目标和干预，所以猜想、灵感至关重要（4.6.3）。

4.5.5 局部边际效益，整体边际效益

事物的实际演变由局部干预导致的整体相互作用决定。评估干预的好坏，可以借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益概念：一切干预都会产生局部边际效益，同时产生整体边际效益，成功的干预显然意味着至少局部边际效益与整体边际效益同时为正。如果干预的局部边际效益为正，但整体边际效益为负，

说明一定有其他局部受损且损失大于其他局部的正收益；如果局部边际效益为负，但整体边际效益为正，则是以牺牲个别局部换取整体效益，比如以短期的局部利益受损，换取长期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获益；如果任何局部干预所带来的整体边际效益均为0，则类似经济学概念的帕累托最优——没有任何局部可以在不牺牲其他局部利益的情况下获益。

一般而言，凡施加干预总是因为存在着局部边际效益为正，因此，推动发展的关键是要保证整体边际效益为正，包括哪怕局部边际效益为负。更细致一点，最好不仅干预的直接局部边际效益为正，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局部受损且能够获益，整体边际效益无疑更加为正，可持续发展所说的无疑正是这样一种发展。容易理解，由于整体可能非常复杂，存在很多局部，整体机制就更复杂，因此人们在推动发展时，容易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只注意到直接局部边际效益，而忽略其他局部及其边际效益，忽略整体边际效益；二是即使意识到了整体边际效益，也意识到了其他局部及其边际效益，但在不清楚整体机制的情况下很难评估；三是都意识到了，那么，如何去找、能否找到最好是所有边际效益都为正且最大化的局部干预。

4.5.6 整体的两大基本类型：有限机械整体和开放有机整体

不同的事物意味着不同的整体，其中可以划分出高度相异但都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两大基本类型，本文分别称为“有限机械整体”和“开放有机整体”，其他还可以划分出“无限机械整体”、“有限有机整体”等类型，“开放机械整体”看来还没有出现——比如，人工智能还没有真的发展到开放性的智能。整体的各种性质或许在这两类整体身上都有值得研究的不同表现，放在本节，是因为可以沿着干预的边际效益概念，简洁地指出这两类整体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差异，而它们的发展性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顾名思义，“有限机械整体”是很多（不是全部）自然科学、技术涉及的整体，比如牛顿力学世界中的很多事物，在这里，每一个事物（比如力学的“运动”，或者“计算机”）的要素、要素间的关系以及关系的属性看起来是有限、确定乃至唯一的，这样的整体在很多时候似乎可以完美适用先验、确定、局部、线性逻辑，进而决定了常规逻辑下仍然可以不断发展。原因是，对这类整体，人们很容易再次进入“同一”事物——因为要素有限、确定从而容易界定，进而由于要素、要素间的关系以及关系的属性又是有限、确定乃至唯一的，所以原有的各方面知识也仍然适用，从而将原有知识视为先验地加以运用，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生产一台计算机，最终能够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世界中存在很多这样的机会，所以，先验、确定、局部、线性逻辑仍然能够继续

取得进步。但仔细思考能够发现，这里的一切只不过是整体的特殊形式，本质仍然是关系、整体、同时性等，比如计算机的主板、机箱、软件与CPU构成一套关系，在“摩尔定律”发挥作用的年代，需要各方面同时变化才能进步得更快，但因为这里的要素、关系相对有限和确定，所以人们只需要像范式转换^[18]所说的，某一瞬间意识到问题了，转换了范式（比如增加了“注意协同CPU更新匹配其他部件设计”），就又可以按照先验、确定、局部、线性逻辑“发展”了。但无疑，即使对于这样的整体，推动进步最快的仍然是那些有意无意具备了非先验、关系相关、整体、同时性等思维能力的大脑。

“开放有机整体”的最好例子就是完整意义上（相对于生物意义上）的人，进而人群、人类社会，以及或许包含着完整意义上的人的角色的知识体系如艺术、社会科学、哲学（包括思索世界本源的自然科学）。开放有机整体相比于有限机械整体存在两大核心差别：一是要素、要素间关系、关系的属性具有自我能动性（比如一个人随时可能在改变想法和行为）以及开放性（比如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潜力有多大），从而当然也更加丰富、多样乃至无限；二是要素、要素间关系、关系属性的能动性和开放性其实是朝向各自局部角度的最优整体性的（比如每个个体其实在朝向自身所能认识到的利益最大化方向行为）。这两个差别决定了，试图以先验、确定、局部、线性思维这种对有限机械整体而言近似可行的认知和干预模式去对待开放有机整体，既是一种过度简化，这种过度简化还压制了开放有机整体的潜力，又是一种过度复杂化，因为本来这个整体中的局部具备一定的自我能动性。

4.6 整体主义认识论

4.6.1 知识与事物本体的同一性

如果建立一个广义的“知识”概念（这具有很好的合理性，因为感知、猜想等相比于任何狭义定义的知识，实质差别其实远比一般想象的要小），我们的世界其实是我们的知识世界。

但是，有必要将事物的知识性进一步近似地分成两类：一是事物存在并被定义于抽象符号（包括语言）、意义体系与“事物”的关系中；二是事物存在并被定义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这里试图将抽象符号、意义体系与其他事物（本质是其他知识）做一个区分，这其实非常困难，但这样做的实践意义很清楚：我们需要努力区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究竟是来自于我们的符号、意义体系，还是来自于“事物”本身。符号、意义体系常常替代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不断的知识生产、隐藏于不同知识间的相互支撑（比如

现状知识大多都隐含着先验、局部、线性思维), 以及人的思维处于这样的关系体系中, 导致了“事物”常常不过是有问题的理论范式所“看见”的意象。因此, 应非常慎重对待知识和知识生产。

4.6.2 真理与知识的本体: 真即一致性, 穷尽一致性

没有先验的客观, 真理的本体是什么? 事物是关系的, 但也在关系获得了确定性, 确定性的本体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奇怪。但实际上, 真理是一个普遍适用于知识的事物, 由此, 它应该有一个脱离具体知识的本体。现实中的主流真理观, 归根到底, 真理是指真的道理 (Truth), 真是指一致于 ($\rightarrow$) 客观 (Objectiveness), 即 “ $\rightarrow O$ ”。容易看出这里的非关系性、线性及疑问: 人们把一个理论结论作为 T, 而实际上一旦前提改变, T 就不再为真, 那 T 究竟是不是真理? 进而, 不存在 O, “ $\rightarrow O$ ” 就不成立。正确的答案是: 真即一致, 且归根到底是同时性一致, 即 “ $\leftrightarrow$ ”——一个人做出“真”之判断, 本质是判断了某个“一致”, 比如法庭要求证言“真相, 只有真相, 除了真相别无其他”

(Truth, only truth, nothing but truth) 的本质含义是, 如果法官问证人“看见”了什么, 证人要告诉法官自己“看见”的, 是这种一致, 与证人看见的是不是幻象没有关系; “ $\leftrightarrow$ ”是一个不同于“ $\rightarrow$ ”的可以独立成立的属性, 事物可以基于“ $\leftrightarrow$ ”而同时性地得到成立, 如同 4.3 中的婴儿获得的对世界的第一点认知。据此, 我们可以说, “一致性”是真理的本体——这意味着真理始终都存在于关系中; 从而, 只要在自己的关系中, 且关系中的一致性的确成立, 上文的那个理论结论始终是真理的一部分 (即, 一个具体真理是“结论、前提、一致性关系的完整命题”); “同时性的一致性”是最基础的真理本体。

一切事物都是某种一致性。所谓的“不一致”, 其实是一种一致的不同于“一致”的属性。不同具体属性的一致性, 构成了不同的具体真理、具体知识。事物一致性的不同属性, 归根到底依赖于我们的感官, 即我们可以想象, 色盲者看到的世界与其他人看到的不一样。各种一致性的累加, 最终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复杂认知 (即复杂一致性), 也是世界之于我们的本质, 最终我们大脑中的概念实际上是很多一致性叠加在一起的复杂的“集合一致性”。各种一致性的累加, 相互间构成的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决定了整体性——某种整体内在逻辑。所以, 尽管色盲者与其他人看到的世界有差别, 但除了很少时候, 所有人理解的几乎是同样的世界——因为归根到底不是某个局部一致性, 而是各种一致性集合形成的整体一致性才是最具决定性的; 由于所有一致性之间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最终的整体一致性在

色盲者和其他人身上的差别不会大于在普通人之间的差别。沿着这里的逻辑思考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知识, 大概就能说, 一些哲学家试图寻找的“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一”, 其实是这个朴素的“一致性”。从这里, 我们已经能够想象人脑的强大了 (4.6.5): 关于世界的整个认知、我们的一切反应、行为, 实质都是大脑在同样强大的感官体系 (能够感知到很多不同的一致性属性) 的帮助下, 从最初的一致性 (4.3) 开始, 通过获取、记忆、整理、结构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的一致性, 逐步积累建构形成的高度复杂的“一致性网络”所给出的“指令”。

到这里, 我们的认知已经从事物是关系的 (4.4), 进一步超越了常规视野看到的各种具体关系属性, 而深入到了关系的基本属性——事物是一致性的。

反过来, “求真”即彻底搞清楚一个事物的一致性, 即“穷尽一致性” (这在具体操作上常意味着“穷尽一致的一致性”)、穷尽整体; 错误的本质是不一致 (实质是错配的一致性, 因为一切事物都是某种一致性), 也因此, 错误常常是事物内在的 (即不是别人要批评, 而是自身存在内在不一致, 本质是自身在寻求一致性时出现了错配而不自洽)。显然, 穷尽一致性常常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常识已经告诉我们, 搞清楚事情的“整体”很难;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整体”不仅仅是通常以为的“所有局部”, 还包括局部之间的关系、整体性, 并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关系与一致性, 其中很多相对于人类现状思维非常隐蔽。穷尽一致性首先需要突破的, 往往是符号一意义体系常常代替“客观”为人们建立了很多不一致性。但是不仅符号对具体关系和一致性的简化替代有必然性, 而且复合关系与一致性的复杂性, 也使得“浓缩”关系的简化替代有必然性。后者, 也导致了可解释空间很大的概念或符号的大量出现。所以, 任何概念的准确含义, 都只有穷尽其一一致性, 才能真正获得, 否则一定是在“囫圇吞枣”。例如, 什么是“本质”? 当我们意识到下文的元一致性、元整体结构等 (4.6.4) 之后,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一概念。

4.6.3 以同时性逻辑为基础的穷尽整体猜想与检验

认识事物可以比拟为相对事物本体之形成的逆向感知行为。事物是非先验的、关系的、最终是同时性的一致性, 启示我们在认识事物时, 同样需要运用同时性逻辑的猜想。同时性逻辑中包含线性逻辑, 反过来则不然。线性逻辑所适用的, 实际上是已经被认知的事物。所以, 爱因斯坦说“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17], 他看到了一个重要的真相——我们观察到的已经包含在理论中。但他没有说出或意识到这是一个揭示了线性逻辑的缺陷的真相——当人将理论先验化并顺着理论线性化思维时, 他将永远看不到新世界; 而实际

上人可以同时性逻辑地一边猜想新理论，一边自由地用各种既有理论和正在猜想的新理论“看”世界，然后看其中最匹配（穷尽一致）的一致性是什么。爱因斯坦自己的思维实践显然是在不断重构自己的理论，然后才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一旦停止了对理论的重构，他的思维的最大生命力也就消失了。所以，线性思维根本不是创造性思维，这是计算机都可以做到的，本质仍然是记忆（尽管可能是非常复杂的记忆）的运用。

由于归根到底事物是非先验、同时性、关系、整体、猜想的，所以正确的思维方式应是以同时性逻辑的整体猜想为基础，并通过对猜想的检验找到正确的思想。

(1) 不先验化需要思考的对象任何方面，而是对需要建立的思想的各个方面以及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同时进行自由猜想；且即使猜想随时都可能是某个“点”而不是“关系”，这些点也会被自觉地组织进入关系、进而整体中（至于进入哪一个关系与整体，同样也非先验，而处于被自由猜想中）。任何局部的意义都是（即便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关系和整体中被确立（4.4.3），理解整体意味着要理解所有局部的总和逻辑，所以猜想整体是一个一定程度上包含但又不同于猜想局部的事情，一般而言无论难度还是价值都要远远高于猜想局部。例如，所有写文章的人使用的都是差不多的文字，但同样的文字只有组织成了一篇好文章（好的整体性）时，每一个文字以及整篇文章才焕发出了光彩。同理，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理论上其实每个规划师、政府、学者都拥有无穷的“局部”，我们的规划、政策、论文中堆砌着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经验、新分析，然而如果它们没有构成足够好的整体，就不会有真正好的规划、政策、知识。所以，规划师、研究者常常以为自己做了很多研究，实际上是各种局部的分析和思考（且一般还是线性的）；局部积累和研究有价值，但最大的挑战、最有价值的研究是对整体的建构并最终找到穷尽一致性的整体，且那样的整体往往并不需要很多新奇的局部。

(2) 思维对自己猜想到的所有关系、整体进行检验，直至留下穷尽一致的猜想。线性逻辑在检验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一般的检验最终会归结于已经认知到的一致性，从而整个思维活动以线性逻辑结束。这当然不排除最终检验还是需要依靠同时性逻辑；并且，即使线性逻辑的检验，其过程中实际上也需要随时运用同时性逻辑，比如，检验哪里、用什么方法检验、是不是真的该用线性逻辑，都首先需要开放的同时性逻辑的猜想。

(3) 穷尽猜想。找到能够穷尽一致的整体显然不容易，就像可持续发展，真正难的不是提出这个理念，而是能不能

找到这样的干预——使所有局部边际效益都为正。能不能限定猜想的范围，以更快地获得答案？现实中，人们常常在“领域”中寻找，实践也常常证明有效，但这不应被先验化——“领域”只是猜想来源之一，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来源，但这也常常是陷阱的所在。要想找到正确答案，归根到底没有捷径，而只能依靠穷尽猜想。并且，由于检验归根到底也是同时性的，所以能够穷尽一致的猜想，一直要到找到了，才能够意识到找到了。因此，相对于给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批评再容易不过了——在有限甚至唯一的穷尽一致性之外，所有猜想都存在不一致。

(4) 因为正确知识归根到底由猜想获得，猜想来自灵感，所以灵感至关重要。灵感似乎无规律可循，但至少有三点比较确定。一是灵感是大脑的天赋，更多的鼓励和运用会使大脑的这一能力变得更强。二是灵感的来源最终似乎还是既有经验和知识（无论意识中的还是潜意识中的），因此，有效的经验、知识积累有助于好的灵感的产生。当然，相对于按部就班地“调用”已知，灵感是一种完全自由、开放、极速的在意识和潜意识中搜寻和调用既有经验、知识的过程，也就是，这是一个“灵感能力”对经验知识积累的处理过程。三是似乎存在好的启发、激发灵感的环境或经验过程，比如富于启发性的交流，所以那些重视和拥有好的交流氛围与习惯的社会是智慧的。

4.6.4 整体结构、元整体结构与关键局部

但是，仍然有一个可以提升“以同时性逻辑为基础的穷尽整体猜想与检验”的效力和效率的方法：抓住事物的整体结构，尤其是元整体结构。“客观”事物实际上有无穷局部，但整体性是有限甚至或许唯一的（4.4.7）。比如语言，具体符号可以有无穷的可能，但最终作为完整的语言体系，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其实非常高^①。事物的整体性的内核可以表达为事物的整体结构，尤其是奠定了事物的元整体结构。抓住事物的整体结构，特别是元整体结构，将非常有助于“解蔽”（如纷纷繁繁的局部对整体的掩蔽、枝枝蔓蔓的逻辑对核心逻辑的掩蔽、符号一致性对事物本身一致性的掩蔽）而直切要害。

元整体结构包含着对于事物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的局部及其关联关系，这些局部及其关联关系称为事物的基本关键局部。但同时，由于事物演变的动因是局部，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那些自身的改变能够导致特定整体性实现的局部，都是特定情况下的关键局部，称为特定关键局部。这两种关键局部有所不同，特定关键局部可能平常很不起眼（比如“蝴蝶效应”中的蝴蝶）、不一定在元整体结构中，

① 库恩有一种“不可通约”的说法，与这里的“相似”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整体的复杂性——很难穷尽一致。

从而也具有很强的特定性，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有多种可能，且不同的特定关键局部相互间不一定是兼容关系。但任何时候，基本关键局部一定稳定地有自己的角色的存在（尽管具体角色状态不一定一样），从而也一定是特定关键局部的候选。

抓住事物的元整体结构（同理，可以有元关系、元一致性、元最优整体性、元穷尽一致性等），实质是在深度上实现对“整体”的把握。事物的内在逻辑总是会不断驱使人们越来越“整体”，但由于人本身也是整体的创造者，所以这个逼近的过程往往是整体变得越来越“大”但在深度上却始终没有真正抓住元整体性，而变得越来越大整体反过来吓退了人们去彻底掌握整体的努力。实际上，现实中人们主要是从广度上向整体接近，而更有价值的其实是从深度上接近，因为前者往往是整体膨胀了，但并未触及整体的核心逻辑，而如果深度上完成了对（元）整体的把握，哪怕广度上再多，道理其实一样。所以，一切知识有效地到达了哲学，就实现了知识的严密。在一个膨胀的世界，社会缺乏元整体结构自觉，由于广度上各种枝蔓的干扰，人们会遗忘深度上的本质，遗忘基本关键局部，比如，经济上习惯了用 GDP 以及各种各样的数字为指标，讨论了过多的企业和资本之后，人们会忘了思考经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人们能够结成一种最优的生产关系并在其中不断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和再生产，还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不断实现物质产品的生产？

本文正是在揭示思维、行动、发展和我们的世界的元整体结构。

4.6.5 整体主义思维，正确的教育与知识积累

至此，基于非先验、关系、猜想、同时性逻辑并最终由整体来建立确定性，这种认识论的应用方法就确定为：同时性逻辑、结构性思维的穷尽整体猜想与检验。如果大脑以这种方法进行思维，本文称为整体主义思维。整体主义思维听起来比常规思维复杂得多，可行吗？事实是，整体主义思维比这里已经表达出来的难度还要大，但对于人脑而言，不仅可行，而且从来都是真实的存在，只不过在我们的现实中，整体主义思维的能力和运用常被极大地压抑并弱化了。

（1）“同时性逻辑”的“穷尽整体猜想”，不仅意味着无限可能，而且意味着无限复杂（同时需要想到很多直至无穷）。但实际思维决策常常很快，这要求很多猜想和检验实际上瞬间完成；并且，由于思维的基本目的和路径其实是直接猜想匹配正确答案（即穷尽一致性答案），从而一般会证伪了旧猜想之后才进行新猜想，因此瞬间完成的很多猜想与检验中实际还包含了清晰秩序；且虽然是瞬间，任何一次证

实或证伪、任何一个新猜想，显然仍不能缺失对现有知识的调动和运用以及灵感的发动。但实际上我们的大脑正是这样工作的——设想一个规划师被告知要去承担某一个新地方的规划，在一瞬间（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她的大脑中可能已闪过了对该地现状以及规划方向的多种猜想，并很快证伪了其中大部分直至留下一个或几个初步有把握的想法。

（2）已经指出，我们“看见”的世界其实是我们的知识的“意象”，它是如此地丰富、无穷、真实、外在，而其实完全是我们的极为精巧的意识结构。这种极其丰富的“看见”甚至只是在无意识中就完成了，这说明了瞬间、同时性地，人脑能够驾驭怎样的复杂性。我们的大脑是如此伟大。

（3）实际上，关系、同时性等本来就是思维认知世界从而建构世界的基础路径，所以不仅世界是关系的、同时性的，人类思维的天赋本能也是整体主义的（4.3）。是人类自己的误解，误导着自己的思维模式。这种误导并不能改变认识和世界的本质，从而也不能完全改变正确的思维模式，但会让人不断地自我暗示从而扭曲自己的主动思维行为。比如，中国的学生在答题时，常常不是自己去穷尽猜想建构答案，而是在大脑中搜寻哪本书的哪个角落有答案。

（4）整体主义思维实质是一种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是人脑的天赋，但其初始状态并不强大，需要通过反复运用，并结合认知的扩展，而不断成长。而且，由于整体性是世界的本质，因此整体主义思维能力的成长也具有天然的内在动力。但是，如果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思维环境是促进先验、确定、局部、线性思维的，那么就会对天赋的整体主义思维能力的成长带来严重抑制和扭曲（并不可能完全消灭）。如果教育一方面强调权威、书本、灌输，另一方面远远没有给足孩子们自己思考、猜想、纯粹基于理性（本质就是关系、整体性等）检验判断的空间，他们长大以后，就会非常习惯于基于书本的先验、确定、局部、线性思维。内在的不够强大和外在的误导所导致的非整体主义思维的大脑，会越来越失去灵性、越来越体会不到思维的快乐^[19]和研究的快乐，因为只有自己的主体性，只有自己发展和创造新知识^①，才是最令人兴奋的。

（5）误导不仅可能来自于教育，事实上知识本身——包括那些真正优秀的知识——也很容易造成误导。这是因为，当前人类社会对于同时性逻辑、猜想等缺乏足够的自觉，从而知识的呈现一般都是线性逻辑的、确定的。但实际上，人们看到的知识，已经是知识生产过程最终留下的猜想和证实性检验，知识生产的最精彩部分、真正的思维过程被丢掉了。先验性思维还会让人们将知识视为需要记忆下来的一个个

① 绝对意义上的新知识的创造实际上不具备操作性，具备操作性的是不断超越自己，然后，结合科学的研究方法，最终有可能获得绝对创新。

“正确”的“答案”。真正正确的态度，应是将知识理解为一个特定的一致性整体，它们用于学习时，是关系性、整体性思维的案例，用于应用时，是猜想的素材。

5 中等发展陷阱的本质与突破，城镇化和城市与区域规划

整体主义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对比先验、确定、局部、线性的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逻辑，不仅为理解“包罗一切”式解决方案的本质、原因及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也为解释中等发展陷阱的本质、突破原理以及正确理解城镇化与城市规划提供了理论工具。

5.1 中等发展陷阱的一般本质

基于 4.5.5，发展进入停滞意味着干预的整体边际效益趋近于 0 乃至为负，即任何局部干预，即便在自身局部的边际效益为正，却在其他局部造成了总和相等乃至更大的负效益。那么，为什么之前可以实现局部边际效益和整体边际效益均为正的干预，此时不行了？是否已经不存在局部与整体边际效益均为正的干预了？如果存在，为什么一些社会似乎找不到它们？

首先，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干预等并非先验的一个证明，它们的自身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发生变化，这导致了即便原先非常成功的发展模式，随着发展也可能变得不再有效。

其次，上述转变之所以发生的实质机制，在于发展的本质在于整体（4.4.3）而不是局部，对发展（效用、效益）的感知和发展的机制均是如此。例如，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几乎任何实物产品都意味着效用，任何实物生产都意味着发展，此时环境、文化生产、社会关系等的效用意义却可能很低；但当衣食无忧时，原来的机器其实可以一直开下去、产品可以一直生产出来，对人却不再有效用从而不再是发展。即，是每个时刻的生理、心理（现状人们更习惯于区分为自我意识和社会文化）满足情况的整体决定了效用，决定了什么是发展。发展的机制同样是整体的，包括“生产”需要呼应于需求，同时“生产”本身需要多方面协调配合。所以，用破坏环境的方式发展经济，在发展初期，人获得经济带来的效用，此时环境效用不显著从而该局部的效用损失也不显著；但随着经济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而环境的效用含义上升，此时即使环境破坏和原来一样，效用损失也在增大，同时环境破坏又可能破坏了环境相关产品生产的原料从而破坏了相关生产机会，此消彼长，最终整体边际效益趋 0。

第三，发展水平的上升，意味着整体边际效益为正的干预的可能性在快速下降。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发展的本体（人能够感知到的总和效用即需求，和相应的效用供给，即与需

求对应的“产品”）与“生产”能力必须同步扩张，两方面的扩张都要求各自的内在整体性能够始终保持良好状态。但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其整体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复杂，内在冲突性的可能也同样变得越来越多。这不仅可能使原有的发展路径失效，而且总体上我们能够想象，要在更多更复杂因素中实现穷尽协调，其可能性要比在相对简单要素间实现协调小得多。这决定了在发展初期，人们似乎不需要仔细考虑发展的内在机制，也很容易实现发展，但是随着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再想粗放地决策就能推动发展就不行了。

第四，发达国家的存在，表明仍然有整体边际效益为正的局部干预存在，那么为什么进入中等发展陷阱的社会找不到？那些国家不也都在努力从发达国家“拿来主义”吗？原因正在于，每一个“拿来”只是一个局部，放到新的环境中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整体，从而不再能够发挥出原有的效力。无论如何，到达中等发展水平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且整体性继续优化已经相对很难的整体，需要非常高质量的思维，才能设计出突破中等发展的干预。但是基于先验、确定、局部、线性的世界观，人们就无法自觉地跳出原有干预模式，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不带先验性地从整体最优角度去分析和设计新的发展方案，人们想到的“要突破（要改革）”也夹杂着大量不可改变的包袱；且即便真的尝试彻底突破，在没有整体主义自觉的情况下，人们既不大敢于尝试全系统猜想，又难以自觉进行整体结构、元整体结构性思维，从而很大一部分关键局部直接从视野中逃脱，使得几率本已大幅减小的情况下，进一步减少了找到正确局部干预的机会。

第五，非整体主义的世界观还会导致一些急躁的陷入中等发展陷阱的社会盲目地从一个错误到另一个错误，因为先验眼光会让人们去不断尝试过去看来正确的干预。盲目试错下还潜藏着危险。一是先验、局部、线性思维导致人们看不到整体从而看不到整体性风险，或者看到了却以为没有办法（因为发现整体已经极其庞大复杂超越了“包罗一切”式干预的可能），最终整体性风险越来越累积；二是被先验观绑架着，尝试某些被先验地认为绝对正确但实质上对特定时间地点下的整体破坏性很大的局部干预。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一个社会发展到达中等发展后，不仅不再往上走，反而最终走向了崩溃，比如前苏联的解体及其金融危机的发生。

可见，中等发展陷阱与包罗一切式的伪整体性思维及其背后的先验、局部、线性世界观具有本质性关联。

5.2 突破中等发展陷阱的一般原理

中等发展陷阱的一般本质，启示了中等发展的一般原理。

首先，突破中等发展陷阱意味着要找到并实施能够继续优化整体性的局部干预，证伪社会到达了帕累托最优。

其次,在明确找到能够继续优化整体性的局部干预之前,应当多谋慎动——不做比做错好,因为“中等发展”后,干预的整体边际效益为正的几率大大减小,精准干预远比以前发展阶段重要。

第三,要寻找能够继续提升社会整体性的局部干预,需要抛弃先验、局部、线性逻辑,转型整体主义逻辑。这种转型绝不容易,处于既有思想的关系体系中的思维会时不时被隐蔽的旧范式给拉回去^[7],而整体主义思维也是一个朴素但内容丰富庞大的体系。

第四,必须能够找到继续提升整体性的局部干预。因为概率已经相对小,需要的检验又非常复杂,所以即便已经转型为整体主义思维,能否找到有效的新的局部干预也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能够结合整体结构、元整体结构进行猜想,会提高效率;对各种解决方案、创新解决方案的积累也至关重要;最后,强大的整体主义思维能力是依托。

5.3 人类社会的元整体结构、中等发展陷阱及其突破的具体原因与特征

更具体地理解中等发展陷阱及其突破,需要具体理解人类社会的整体,我们通过尽可能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元整体结构来实现。

5.3.1 人与世界及其发展元整体结构示意图

关系、同时性逻辑、整体、整体性等概念可能比较抽象,好的整体结构图是抓住并形象表达整体及其结构的有效手段。什么是好的整体结构图本身是一个问题。今天,整体作为事物的客观属性,已经促使人们有意无意地越来越去逼近和表达“整体”(包括人居三),其中包括以图示的形式,但多数情况下还是在表达“全部”,例如谈及城市规划,用一个大圈,圈上无数小圈,每个小圈中填上城市规划的一个“子范畴”,合在一起成为城市规划的“整体”,基本还是将“局部”堆叠在一起的“包罗一切”。好的整体结构图,需要在真正理解事物整体性的基础上,以清晰的结构层次表达出事物的关键局部、一般局部、局部间的关联关系等。

图1是关于人与世界及其发展的元整体结构的猜想。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所以最终的图示不得不试图抓住核心内容。同时,图中用曲线(基本都是双向箭头,意味着“同时性”)表达不同“局部”间的相互作用。显然,可以从这张图引申出更多、更具体的相互作用,比如人力资本与创新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或促进?规划如何影响了经济?

将相应的相互作用表达出来,就可以得到很多具体事物的元整体结构。但为了表达清晰,图中仅仅保留了最核心的一些相互作用图示。已经指出,事物的属性不仅存在可变性,而且属性本身也并不都是我们所习惯的 $1+1=2$ 式的确定性,且最终可能仍然是猜想等(4.4.2、4.4.4)。因此图1始终可讨论,但这不影响足够穷尽一致的猜想的价值。

“人类社会”实质是“人与世界”这个更大整体的某种局部化概念,因此彻底理解人类社会,需要穷尽其真正的整体。图1表达的人与世界及其发展的元整体结构是,人——更确切地说意识——居于一切的中心,整个世界(与“意识”同色的外框)是意识的整体^①。包括“意识”本身、“人”、“外部”,都是意识基于对关系、一致性、整体的感知和发展,人为界定、自我规范的结果。人的“行动”(人的其他能动性)在“动机→其他意识或下意识”的驾驭下,帮助实现了“意识”的成长并落实意识。“社会”是“个体”的集合,主体性、所有能动性的根本仍然是个体的人。社会的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水平的投影。人这个中心,既是目的,也是原因、动力、主体。

图1将人为界定出来的“外部”归纳简化成四个方面,其中三个方面——文化、经济(即一切“劳动”及其产品和度量)、集体|政府——实际是人自身的外部化。因为世界本质也是意识的世界,因此内外部实质是人的某种权宜界定,且各种“事物”相互间也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或“同时性”(所以图示中的方框都是跨文字而绘)。人们总以为是外部在干预,其实是人自己的意识和干预。且每个人都在干预——人的一切行为,归根到底是个体的行为,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个整体的局部,都“干预”着这个整体;而且,一切行为都在干预——“做”是一种行动,“不做”也是一种行动,就像改革开放,归根到底可能不是政府做了什么,而是有些方面政府不做了、放开了。与人们想象的大动作就是作用大的干预不同,对于整体而言,整体效应最显著的干预才是最大的干预,而何时何种干预整体效应最显著,需要特定整体去看(4.6.4)。过于夸大局部的作用不对,但每一个人试图逃避自己的主体性,则是另一种误区。发挥人的主体性,也并不意味着与“外部”对抗,因为“外部”如同“客观”,原本是中性的,是“主体”要思考如何行为,才能让自己和外部所构成的整体拥有最优整体性。

① 请不要试图在这里粘贴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之类的标签,很多现有概念是人类在认识不断向整体靠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本质上仍然过于简化、非整体的概念,不能跳出对它们的先验化,就很难接近事物本身。

图1 人与世界及其发展元整体结构猜想 (及其中“我国现状发展”突出局部、“人力资本与创新”元整体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5.3.2 发展由非常复杂的整体关系体系决定，但思维始终是其中最关键的局部

当意识到连发展的本体也依赖于人对效用的感知（5.1）、动机是一切的起点时，我们就能意识到，就连需求的扩张，都要靠思想的发展来使一个社会的追求更加多元化、丰富化。需求来自于身、心两方面，更大的扩张空间显然在后一方面。

能力归根到底来自于思维。当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从而一般需求和供给已经实现、社会整体更加复杂时，需要思维能力同步提高以更加严密和更有创造力，从而能够认知和优化越来越复杂精巧的整体性。

同时，因为没有一成不变的先验性，所以持续发展实际上不会存在一成不变的确定模式，而一定总在不断面临新问题、新要求，因此一定是由于思维能够不断意识到问题并不断因时因地制宜地创造出新的有效解决，才推动了发展继续向前。现代化实现的根本原因是思维能力的现代化。“西方的智慧”^[20]不是某个具体解决方案，而是这种思维能力，当这种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后，那里的人们进而社会就爆发了。

5.3.3 思维与思想持续进步的关键影响因素，除了纯粹内在，还包括社会、符号—意义体系、思维中的深层范式、其他（正规）知识、教育、社会规范与文化、环境内涵文化

社会作为个体的集合，对人的思维成长或许发挥着最大的作用。最大作用的第一点，是提供了“同类”这种榜样性——“个体”会下意识、有意识地模仿自己的同类。西方现代化突破的具体关键，应是由文艺复兴开始的不断超越人类思维边界的杰出（广义的）思想家们，潜移默化地激励了他们的同类去模仿并超越（模仿的一部分）他们。整个社会思维质量的蜕变——而不是任何其他可以简单复制、被“拿走”的手段，决定了发展水平的蜕变。社会对人的思维成长发挥着最大作用的第二点，是提供了思维成长和思想形成所需要的最关键营养：交谈讨论（其实是高度接近整体主义思维的一种实践；当然如果连交流也变得程式化、套路化、毫无深度和广度可言，那就另当别论了）。批评与启迪、灵感的最大来源、最鲜活丰富的“现象”，一定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别的。因此，缺乏足够好的思想者群体和思维环境，包括一个社会的“高水平”思想者中，线性的缺乏突破的规范性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局部性研究远远占据主流且不自知，一定是进入中等发展陷阱的原因之一；反之则几乎必然可以突破中等发展。

意识可以首先划分出两个方面（4.6.1）：一是关于“事物”的意识，二是“符号—意义体系”。思维由于简化的必须，

而发展了试图简化再现“事物”、力求与“事物”一致的“符号—意义体系”。科学研究，究竟是文献重要，还是事情重要？问题一旦问出来可能令人恍然大悟，但现实中人们往往跳不出符号—意义体系（语言、理论、概念），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逻辑到书本逻辑，用书本逻辑检验事物、约束事物（包括约束自己的思维），而忘记了知识归根到底是对事物的认知，检验的标准归根到底是事物本身，一切学习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地回到事物（包括回到“自己”的思维）。当然，“事物本身”、“自己”究竟指什么，同样是复杂的哲学问题，但答案已经包含在整体主义中。被符号—意义体系套住（本身说明符号—意义体系或理论、科学被先验化），必然不可能创造出穷尽一致于事物本身需求的干预，而自身思维能力的进步也就同样被套住了。

思维中，深层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知识生产的质量。当没有对这类深层知识的自觉和检讨时，诸如先验、局部、线性化等深层次误区就会长期停留于思维。哲学是必需的。但是我们现实中常见的把哲学变成了课本上的哲学时，哲学也背离了其应有的本质而变成了另一套先验的符号—意义体系。哲学的本质应是思考深、思考全、思考透、思考得能够跳出一切框框，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能力和实践。这本应是教育的最大目标。

其他知识、社会规范与文化、环境内涵的文化，都从不同侧面有形无形地塑造着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思维。所以，这些方面能否有更多真正的高质量（并不需要全部是，低水平也是整体的有益组成部分），极大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思维的成长。

5.3.4 社会及其发展是复杂的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复杂性的进一步提升，挑战着社会能否仍然正确理解整个关系体系、不同局部间的关联关系、局部变化的衍生效应和整体效应

图1表明，人们平常抓的很多东西，在社会发展的元整体结构中并不处于中心位置，但在实践中却被置于核心；反过来，一些被人们忽视乃至试图否认的要素，在社会发展整体结构中其实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比如在“经济”中，“资本”的位置似乎没有现实中那么重要，而人力资本、生产关系等却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环境”中，区位、传统的功能分区似乎不是最重要的，环境能够提供的可以直接对应于人的需求的功能、品质，以及如何生产出这样的功能、品质等要更重要；在政府治理方面，关于税收，我们现实关注的重点往往是税收比例、是否征税（比如物业税），但更重要的似乎是整体逻辑所对应的税收的公共性——羊毛是否回到羊身上、公共性的逻辑如何构成等。同样，对于房地产，存在着其是否是支柱产业的争论，但根据图1，我们能够意

识到空间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关键局部（4.6.4），房地产只是恰好作为空间生产在经济部门的直接代表而获得了现在的地位，所以正确的方向不是否定房地产的支柱性，而是要从解决存在问题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完善整个空间生产体系。

已经指出，元整体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不同事物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一切事物仍然是非先验的，就像4.6.4所指出，元整体结构反映了基本关键局部，但特定情况下特定关键局部可能是另外的。换言之，任一局部在每一个特定条件下的（整体）属性都是特定的。

社会及其发展的复杂整体性，还决定了一些“整体性概念”的内涵其实非常复杂，从而如果人们不能自觉穷尽其内涵关系与一致性，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就一定松散不精密的，比如究竟什么是“以人为本”？人与社会发展的元整体结构或许才能让我们获得清晰理解。所以，因为整体性是世界的本质，从而人们其实常常初步把握到了问题和解决的根本——需要整体性解决，但是不能自觉地对自己提出的概念穷尽一致性，那些概念到了实践中很快成为意义游移乃至松散的包罗一切的概念（4.1），而且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语言、理论以及枝节关系所误导，从而落实于实践仍然不可能有效干预。

最后，由于社会及其发展内含大量要素和相互作用，因此相比于整体逻辑，“局部逻辑”、“局部问题”、“局部冲突”要远远多得多。因此学者、政府如果将关注点放在局部冲突方面，很容易面临几乎无穷的叙述、争辩的可能，但这些关注却不可能真正解决整体发展问题。真正解决问题需要跳出局部，抓住整体结构、元整体结构，从而理解事物的整体逻辑。而不理解整体性、没有元整体结构工具，就很容易被局部冲突所绑架，它们在大声呼喊，顺着局部冲突而制定的干预往往脱离整体逻辑，从而即使有局部正效益，却可能越来越远离整体利益，最终导致中等发展陷阱。

5.3.5 以上几点共同验证了整体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等发展陷阱问题中的重要性

突破中等发展，既包括思想的发展，也包括更丰富的其他方面的发展，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显然不断要求着具体的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如有的时候需要更重视战略、有的时候需要相对集权、有的时候需要积极推进分权、有的时候稳健适度提升社会基本福利能够很好撬动整体优化。但所有这些方面，如果能够整体主义思维，就都容易被意识到和落实。

一个拥有整体主义思维的社会，还将拥有极强的韧性，即对整体性危机有极强的抵御能力。这是因为，大量的个体都在主动寻求其所能看到的整体最优，而不会去选择非常危

险极端的整体性方向，相互间还容易形成互为缓冲、优化、互补的整体效应。所以，越是整体主义思维的社会，应该越具有好的动态稳定性；先验思维则可能导致向极端性演化。

不过，在缺乏足够整体性思维的现实中，社会、政府常常会认为认识论、方法论等都是些与发展无关的东西，它们会把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直接局部干预视为与发展有关，也会把一些过去认为与发展有关的事物视为与发展有关（路径依赖），比如一些上文所称的枝节事物。最大的根本是思想，中国共产党早就意识到了，但对思想的先验化也会导致对思想的重视被庸俗化直至事实上被忽略。其实，中国共产党思想的核心已经隐含有非先验性地追求真理、突破符号—意义体系、回到事物本身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论等），但同样，如果思想没有被穷尽一致性、穷尽整体，那么最终往往会在庞大的思想的关系中，出现自身意义的模糊和游移。而且，不仅早期形成的思想本身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发展水平的提高，即整体的日趋复杂高级，也在不断对理论提出更高要求。

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发达社会建立了整体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吗？直接著作以及知识中所反映出的间接证据似乎都没有证明西方社会已经建立了整体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反而证明了先验、确定、局部、线性逻辑仍然是主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西方社会在实践上，实质基本是整体主义的。其实践上的整体主义，源于西方社会一方面强调所谓天赋人权，强调每个人可以自由思想、表达、批评；另一方面西方思想家从古希腊开始就比较习惯于穷尽思维，以及纯粹以逻辑为标准。两方面的结合，尽管思想者仍然保有先验观，但是开放的批评、穷尽深入、以逻辑为标准、可以任意思想，以及，特别重要地，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基本能够不断创造出足够严密（穷尽一致）的思想，五个方面合在一起，实质效应就是：先验事实上被打破了（如果没有能力想到最严密的思想，光有开放的批评也是不可能打破先验的，因为每个先验并不是靠先验确立地位的，而是靠逻辑），并由自由猜想——这也事实上实现了同时性、穷尽一致性直至整体穷尽一致——来确立答案。

5.4 城镇化和城市与区域规划

在人以思想为基点驱动整个世界不断突破以实现更有利于人的整体性的征程中，城镇化是这个进程的一个局部。因为整体的局部具有整体效应，所以能够从这一角度解释整体的很多特征，尤其城镇化是一类关联效应特别多的局部。反过来，城镇化本身当然也受制于整体，所以，将城镇化概念整体化或者说广义化完全符合逻辑。很多概念都可能因此从狭义变得广义，比如可持续发展，一开始主要是狭

义地关注环境的，最终成了无所不包的“语言”；韧性城市，一开始是关于城市的灾害恢复能力的，但是因为灾害恢复也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经济、社会能力等等，最后也成了无所不包的概念。

城市与区域规划的起点内涵是城镇化背后的直接干预手段，显然也可以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广义化。针对规划理论界在1970年代对“综合理性规划”（Comprehensive Rational Planning）的批判，笔者曾经指出，与规划是一种强制一样，综合也是一种强制。所以尽管有严厉的批评，也有各种让规划局部化的努力，在没有意识到存在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的情况下，实践中还是在不断走向包罗一切的歧途。不仅规划，似乎不少社会科学领域（不包括自然科学，不是因为自然科学更科学，而是因为社会科学与全社会关联，而不只与一个特定整体关联）和公共政策方面，在这个知识生产过剩的时代，都会出现每若干年换一两个大概念但谈的其实差不多、问题之得不到解决也差不多的现象。

既然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成为某种“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那么城市与区域规划应当是怎样一种局部干预？发展，对于任何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都会有特定的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这本身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局部（专业），所以从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的角度，规划中当然也可能提出针对任何其他专业的建议。但从普遍意义上找规划的“局部”定位，笔者认为应是对整体效应最优的物质空间干预的设计。这个定义，实际上让现代城市与区域规划回到了它的起点——无论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还是伯纳姆的《芝加哥规划》，甚至是柯布西耶的《明日之城市》，只不过人们一直没有能够准确说出这些思想的另一半的精髓——“整体效应最优”。实际上不止“一半”，因为意识到局部是容易的，自古就有关于物质空间和物质空间干预的设想，真正的精髓正是让这个局部的“整体效应最优”。这方面古代的实践也有，但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越了古代，所以“20世纪的城市乌托邦”（Urban Utopias）的创造者们^[21]展现了他们的天才。

意识到了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合理定义，也就能够意识到包罗一切的规划和不去自觉关注整体效应（首先是整体性）的物质空间规划都不是好的规划。当然，如何做到整体效应最优，这就又需要整体主义思维方法。

6 中国式中等发展与助力突破中国式中等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与规划改革

每一个整体都是特定的，所以存在“中国式中等发展”这一命题。

6.1 中国式中等发展

中国能够很快到达中等发展，核心在于我们有一套守纪律（隐含着先验性）、重“学习”（本质是跟随、保持，同样隐含着先验性）而又勤劳的文化。制度设计、生产，最大的能力是跟随——古人、别人，人家有过的，我们可以有。如果不是人类进入现代化，我们可能不知道去生产什么——我们自己的发明是停滞的。法度之下的稳定有序、学习各种可能、积极生产，这是中国式中等发展。

但这种发展能够到达一定水平，却难以继续突破。我们古人想象到的最高水平的整体性，包含着稳定有序、劳动投入、成功模式的复制、仓廩实、低水平的民为本、低水平的统治者与社会相辅相成的整体关系。但是，更高水平的发展，不仅包含上述，还包含更多要素，首先需要人和整个社会具有思维的开创性，以及具有更加复杂的开放有机整体的活力，这需要将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有序统筹起来。此时，先验性成了严重制约。实际上，先验性本身内含着“最好”是某一已知状态，而进步恰恰是要不断开拓新的高度。我们的文化中也非常缺少穷尽思维的样本，加上先验性，穷尽整体思维的能力也就很难锻炼成长起来，最终导致深度、复杂、原始的创造力的弱化乃至丢失。即便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有高水平的创造力，那也是先验于别人的原始后跟随而上的。这是整个文化加上后续的制度、教育等共同造成的。中西方教育都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人家看到的是“人”，我们看到的是“巨”。从而，人不在中心，事情不在中心，人的感知、猜想、灵感不在中心（记忆在中心），人和社会就已经很难感知到思想的纯粹乐趣，也很难感知到交流、灵感的价值（因为它们的价值往往只在思想而不是什么别的“效用”），最终人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某个外化小产品，比如，钱！这里说人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应当是思想，对于非整体的思维而言，也很难理解；非整体的思维有很多其他信仰，他们以为是自己的信仰，本质不过是先验化了别人带给他们的某些观念。

先验化直接导致了很难彻底地达到整体思维，但认真学习且天赋不差从而能够局部地整体思维，二者结合，导致中国人常常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就造成中国人既未能突破自己，也不会全盘西化——因为我们既有自己的骄傲，也意识到理论所解释的西化其实存在问题，却说不清问题在哪；同时因为“学习”又会试图以夷为师。不全盘西化的结果，往往是留下了自己文化的小尾巴，恰好显性化了西方文化的漏洞。比如民主，在西方的实践中其实不是先验的，本质（即使他们无意识）是由理性来驾驭的；然而在另一些地方，理性没有成长起来，民主已经被先验化了，于是今天“民粹”流行。

历史地看，中国人和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很快显现出瓶颈。本来，这个阶段需要的是比初级发展阶段更高水平的思维能力才能突破中等发展，需要的是能够回归事物、能够自己思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者（而不是“尽信书”），但是习惯了学习和规范化研究的社会，自由的整体主义的思考能力常常未能随社会进步而同步成长，这样的研究和研究者又为后来者树立着错误的榜样，使后来者也同样踏上这条失去创造力的道路。政府的行为，到了这个阶段，不是先验化这个局部，就是先验化那个局部：部门、群体（包括弱势群体）、理论、规章、领导；而这里本没有任何一个局部先验错误，也没有任何一个先验正确，一切要特定整体具体分析，要有能力拿出让所有人信服的理性答案。对于每一个局部，先验化、非整体观点使之认为责任是别人的，看不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从而“苟且”于一点局部利益，并从眼前到永远一直苟且下去，全然不反思自己参与共谋了一切。而这个阶段，本来需要的是每个局部既不是高高挂起，也不是自以为大，而是能够耐心地想清楚、做到尽可能有利于整体的局部行为，理性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不仅本身存在“天花板”，先验、局部、线性的文化还会导致我们被自己“精致套牢”——越发展，越多“先验”、原则越多、部门越多、知识也越多，没有非先验观、没有整体主义思维，所有这些将意味着越来越重的“包袱”和“绑架”。我们被局部叠加的整体观驱使着，努力做更多的事，努力把自己套得更紧。我们一再说改革，但是我们不知道不仅“祖宗成法”可变，而是一切都可变，只要符合真理。但是，当我们意识不到真理的本质就是整体时，我们仍然不过是用另外的先验来替代此际的先验，其结果必然是各种貌似深刻实则仍然没有到达真理的偏颇简单药方。最终，历史地看，很多改革也常常改成了革命——走向了简单化、情绪化、极端化，即先验化、局部化的。

6.2 中国式中等发展的突破

这不是一个终极蓝图的问题，最理想的那个终点，本身也没有唯一。同时，过程本身，也不会有统一标准，因为每地、每时都是一个特定整体。但是，就当下的整体而言，从最强大的局部干预——政府治理——这个角度而言，怎样的干预可能整体效应最优、是真正的“治理现代化”，从而让社会进入一个归根到底向“高智商社会”^[22] 稳健升级的过程？

（1）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指导思想应该更明确，从而帮助政府和社会冲破思维和实践上的桎梏（实质是各种先验性）。包括法律，一切应可讨论、可修改；只要做对，各地尽可因地制宜。对这样的猜想、创新应有足够的宽容。当然，以真理为标准绝不意味着破坏性地推翻，因为

真理必须小心求证（4.4.7，4.6.2）。唯有回归追求真理，方可突破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字面上的二律背反——一切服从真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含义也才真正落实：《宪法》为一个社会的治理提供第一前提（这是社会在一般情况下保留的仅有的先验）。

（2）对于我们的政府治理而言，应更坚决地转向“有限而正确”、“有限而精准”，坚决放弃一些整体效益确实为负的干预，坚决不去新增说不清楚整体效益的干预，不要被局部冲突绑架、被局部效益导向型改革所绑架。放弃路径依赖，才会有真正的尊重规律。当然，现实中的“放弃”也需要注意负效应，减少不必要的颠簸，防止不可逆不可控的损失，并留有必要的因地制宜的余地，所以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实质是“稳健解套”——从现状的错误干预中稳健解脱出来。

后中等发展时期，不仅局部和整体边际效益同为正的干预的可能大幅减少，而且社会、市场也已经有了很大成长。此时，政府的大脑快起来、手慢下来，不仅有助于避免“做错”，而且有助于鼓励和促进社会、市场更加“主体化”，而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市场在做，不会因为政府不干预而停下来。放弃没有想清楚意义的“发帽子”、扩张、方方面面的形式主义、脱离经济元整体结构的考核等，放弃过度围着资本、企业家、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转，放弃各地进行各种整体零和甚至负的竞争。

（3）主动作为方面，现有格局下，政府治理方面整体效应非常优的干预可能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尊重规律、实实在在地落实以人为本。

十八大以来，国防军事、贪腐惩治、一带一路已经让国家看到了高屋建瓴的整体战略思维和高度正面的整体效益。此外，制度成本的下降、对诚实劳动而不是投机发展的制度鼓励、朴实朴素的生态文明建设等，都属于应该进一步突出优化的“局部”。但还可以看到两个大的整体效应突出的局部干预，第一个就是如何尊重规律、实实在在地落实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元整体结构分析已经表明，以创造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不仅是能否突破中等发展的根本局部，也是造成中国式中等发展的直接动因。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依赖于能否解决中国人创造力的突破即“钱学森之问”。理论努力是其中的一环，政府治理方面，笔者认为需要尊重规律（不存在先验、无原则的“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做好三件事。

更加积极、稳步提升基本社会福利。这是整体效应极优（包括对创造力的促进）、符合规律的“以人为本”举措。中国城市居民曾经拥有过附着于城市户籍的足够体面的福利，改革开放近40年，所有人应该可以享有更好的基本保障，低收入群体应该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体面分享发展红利。第一，这不需要大跃进，所以不涉及一次性过高支出，但是应该旗

帜鲜明，稳步实质性推进。也不需要更多印钞票，而应将目前投向直接生产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更多向“人”转。今天，公共财政原有的投入方式，可能无论局部还是整体边际效益，都已经比不上投入基本福利。不能先验地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公共财政投入方式。基本福利的提升不仅促进人力资本发展，而且本身也会促进消费，从而与我们系统的巨大生产力相匹配。第二，合理尺度下不用担心“福利养懒汉”，事实上当代的很多生产部门（比如制造业）“人手”的减少并不会影响生产力，缺少的是高价值人力资本。第三，这能够让中国户口越来越成为人们对国家的信仰，也能促进所有社会阶层的自信，极大有助于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间接减少这部分社会问题及支出。第四，只有越来越没有后顾之忧，人们才有更多空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第五，福利的稳步提升，将会有效降低教育改革的难度。

教育要更坚决向能力培养转型，大幅增加学生自己思考、讨论、创造的空间。相比于提升福利，这是更长效的工作。

政府对人的尊重、全社会对人的尊重、所有人对彼此的尊重，要放到更高的位置。这体现在对人们想法、意见的尊重，要耐心听，要给更多说话的机会。当整个社会转型“做少、做好”之后，节奏自然会慢下来，人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聆听。事物的价值不是先验而是关系的、整体的，民主也不例外——民主自身并不拥有先验正确性，但是，思维要成长只有持续沿着正确方向练习这一条路，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希望获得思维能力的成长，那就必须给思想以空间和激励（尽管同时又需要注意会不会有其他的负效应、整体效益是否为正）。

（4）现有格局下整体效应非常优的两大政府干预中的另一方面，是对经济社会根本发展思路的反思与创新，寻求将本质上“物质主义”的发展意识形态，进而整个治理体系向真正整体统筹但核心是文化进步的发展意识形态，进而是治理体系转型。

这或许不像（3）那么具体实在，但社会发展的元整体结构已经更清楚地证明了思想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我们现有的发展意识形态是高度以物质为中心的。这种局部性思维，使政府和社会误以为物质不仅是发展的根本目标，而且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图1以广义的“环境”标识了物质方面，它表明应该充分重视物质作为一个关键局部，但它远不是唯一的关键，更不是整体。不过，整体主义已经可以让我们超越普遍意义上孰轻孰重的争辩：任一事物的属性均非先验，需要在具体整体中具体看。中等发展之后，总体而言，物质生产对于发展的边际贡献已经大大降低，甚至一般物质生产力其实已经不是问题（即使

有群体依然在物质上短缺，但本质不是生产力问题）；相反，物质主义+基于物质主义的消费主义已经成为各种问题的来源。比如，雾霾，局部性思维让人们去清算汽车和污染工业，但它实际是整个物质主义生产与消费文化的后果的总爆发。此外，社会文化的物质化、精神文明进步缓慢等，在根本上都关联于物质主义。所以，继续在这一局部边际效益已经大大降低、整体边际效益可能为负的方向上发力，已经意义不大。这其实也是（3）的前提之一。

而且，这种发展意识形态的危害已经显性化于全球，从而全球性对它的反感正与日俱增，继续这种发展模式，会强化中国在现代文明中缺乏积极贡献的形象。其实，这本来是别人文明中的某种特征，但现在连别人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无论如何，不仅是中国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要有文化和以文化为中心的文明上对人类的引领。

显然，这一改变并非简单否定过去，而恰恰是因时制宜的调整。改变的目标也不是变成反物质主义，而是要转变为真正整体统筹、全方位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但中心是创新、多元、高生产力（只是无须都变成现实的物质）而又和谐的文化的发展，一种更高级的文明的形成。这需要更多的研究，发达国家经验也有可借鉴之处。现实中，一个清晰的具体突破点在于：现状经济估值体系、政绩考核体系基本是围绕物质产品的——姑称为“物质GDP”，而“绿色GDP”讨论了半天似乎也还未脱离物质GDP范式，因此特别值得考虑的，是要有“文化GDP”。思想的进步既是根本，又空间无穷，且恰是我们发展中远远滞后的部分。如果货币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够更有效地赋值精神文明的进步，让物质生产去匹配似乎不是问题。

现状对GDP增长速度的担忧，本质是对物质GDP增长速度的担忧，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概念被先验化之后自己吓自己的稻草人！因为GDP不增长并不意味着现有生产力水平和产出一定下降，也不意味着所有人的福利会有丝毫下降。在中国到达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度的时候，这不是个糟糕状态，更不用说如果物质消费的扩张停止其实意味着积极转型。只有旧债增加需要用新产出填补时，才会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所以，我们被自己挖的坑给坑了。有人会担心速度一旦下降会有糟糕的连锁反应，实际上，发达经济体——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经济的韧性恐怕不比我们差。

6.3 助力突破中国式中等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与规划改革

或许可以概括：历史上达到中国式中等发展（当然，是当时的高水平），是守纪律、重学习、勤劳勤奋的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及其对物质文明的生过程；当代的中国式

中等发展，是中国式精神内核学习现代物质主义及其生产科技，进而生产出现代物质文明雏形的过程。从而，突破中国式中等发展，需要的是一个中国现代精神文明突破发展、人的主体性得到确立、创造力极大提升，最终赶上和带动物质文明进一步提升的过程。匹配于这一过程的城镇化与规划改革，逻辑上应该出现下列特征。

6.3.1 助力突破中国式中等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图景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大规模的城市空间扩张（包括各类新区、产业区）基本停止，区域性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新项目也很少出现，出现的区域性交通项目主要是维护、完善性项目。但区域和城市交通的整体系统性、连续性越来越好，并支撑形成了以超大、特大和大城市为中心的高效率、非均衡的节点网络型都市化区域在全国的广泛分布。各级城市中，精致、人性的空间越来越多，其中功能混合并适合人们交流、办公、营商等的室内和开放空间在城市中大量而广泛地分布着，但大部分的单体规模并不大，其中文化空间越来越多；大量工业区再城市化空间出现；交通空间以及交通空间与周边空间的系统整合性越来越好；包括绿地在内的开放空间不仅越来越多（虽然不一定大），也越来越朴素、自然、生态。小城镇、乡村越来越“本色”，更加尺度宜人、易于维护，也都含有少量精致的公共空间和营商空间；其中，都市化区域中的很多小城镇和乡村成为城市居民节假日小憩的场所，并拥有少量的城市功能与空间。人口仍然在往都市化区域集聚，其他地区的城市、县城人口一般在有进有出中保持稳定或略有增长，都市化区域的小城镇、乡村基本能够保持人口的稳定，但其他地区小城镇、乡村的人口总体仍然在缓慢流出。

上述图景的理由（整体效应）包括：

（1）发展阶段已经改变，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相对于现有规划继续扩张规划人口和用地规模的需要。在已经大规模建设若干年后，区域基础设施扩张的意义也在快速消失，因为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投入产出不能平衡的投入是给自己挖坑。现状几十、上百乃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工业区、新区，无论什么级别，绝大多数恐怕都面临“稳健解套”的任务。工业企业在工业化初中期时会几百、几千、几十万家地呈几何级数扩张，但工业化后期或许终将面临近似速率转型的压力。国家内部没有关税壁垒，市场统一，那种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说法缺乏支持其存在的逻辑，因为工业产出效率在高新技术和资本的支撑下已经极大地提高并替代了人工成本。这与制造业需要继续发展没有矛盾，继续发展且要大规模发展的是更高水平、能够替代一般企业的高水平企业。工业空间的转型需求同时意味着工业用地再城市化需求，否则将会大量出现国

外的“棕地”现象。这也表明，很快会有大量富余出来的城市用地。

（2）空间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也意味着重点应更多转向“人的尺度”、功能和品质的提升，而人性空间所需要的内容和文化性，在手法上需要的也常常是“雕刻时光”式的细腻充实、精雕细琢的过程，这样的过程甚至会害怕各种大动作。

（3）其他的空间演变和基础设施配置要呼应上述两点，同时力求最有效率。品质的实现主要不是靠规模，而是靠精巧系统、公共服务、文化性、人性、高效率低成本。其中，“稳健解套”的一个基本模式，应该正是回归有机自然，比如让一个新区未建设部分退建设返生态，“自然”就会不仅照顾好自己，还能照顾好人类。如此伟大无私的自然，我们却常常缺乏敬畏。

所以，抛掉头脑中对城镇化的先验理解吧。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告别绝大多数政府已经推过的城镇化。改造河山式的城镇化阶段应该大体结束，此时再想进行同样的运动，所面临的既不是基础空白、土地尚未有偿使用的1980年代，也不是十年积累之后经济增长爆发前夜的1990年代初，同样不是房地产刚刚启动的新千年伊始，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接下来的是一个无趣的新时代——空间的技术含量，真正的人的城镇化，细致的日常生活公共空间，精细梳理空间系统后通过低成本的有机巧妙干预让它焕然一新。正因为我们空间的整体性不好，反而留下了巨大的提升空间。

6.3.2 助力突破中国式中等发展的规划改革

要从规划法、规划编制办法可以改开始。实践中的规划创新要真正得到鼓励。

规划对物质空间干预的设计，需要从粗放、扩张、增量、大结构、大空间、外来模式套用、内在机制考虑模糊、常常“包罗一切”的蓝图规划，转型为更加精细、关注存量、突出有机系统结构优化、善于整合小结构、小空间、充分考虑空间设计对人的效应以及对经济、生态发展的效应、蓝图与行动并重、有限而精准的整体性物质空间规划。规划项目，或许也应减量、增质、增创新，同时增时、增价、增规划独立性，因为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面对一个远远更为复杂的整体，要努力实现更丰富的诉求的统筹和更高难度的整体性提升。

规划的方法论，也需要由从政府要求、“客观”现状或理想案例等出发线性推导，转型为以对现状、宏观环境、干预可能、演变过程和结果进行同时性逻辑、结构性思维的整体多情境猜想与检验引领的整体主义方法论。

最终，规划要努力成为对的规划、好的思想、理性的解决方案。规划不是要向政府讲述真理，而是要与所有参与方

共同突破中等发展。前文已经指出,现实不是哪一方的问题,所有的街区、道路的后面都站着规划。

7 结语

意识到整体性、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意识到没有先验性、事物可能是多重性质的复合体等,我们就能意识到,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方面的巨大突破。

但处于既有知识所构建的关系中,人们对这一切的认知、评价,包括新一届中央对自己力推的行动的阐释,总体上仍然停留于常规的理论框架中,社会甚至因此存在着对十八大以来的变化的困惑。结果是,即便以似乎无所不能的中国式强大体制力推深化改革、反复要求“自我革命”^[23],现实发展中的路径依赖依然极为根深蒂固。人们不知道,事物的内在整体逻辑,是比任何外力远远更为强大的“体制”(所以政府常常以为政策可以超越规律,结果当然一再失败);而人类社会最大的内在整体逻辑,正是思想的逻辑。

在没有深究当前人类社会的思想的逻辑之前,人居三很可能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中国规划需要加快向人居三所代表的方向转型,转型为更加关心每个人、更加统筹每个方面、更加积极行动、更有道德意识和使命意识、更加打破专业界限、更加由技术向政策转型、更加他组织与自组织协调、更加先进、更加系统……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堆叠”不等于整体、干预却必须是局部的、协同的整体性需要非先验且精巧深入的思维来识别和建构,知道了同时性逻辑、元整体结构、猜想与灵感拥有更重的分量,知道了在它们背后更基础的是事物的非先验性、一切基于关系和整体、人类可能被自己基于关系建立起来的符号一意义体系以及自己对思维过程的误解而误导。从而,上述启示只是与人居三有共通性的“包罗一切”式答案,隐蔽着内在矛盾性和意义的游移,是人们不自觉地被事物的整体本质倒逼所形成的初级的整体思维。包罗一切式思维没有打通局部与整体的内在关联、没有突破对局部的先验化,落实于实践最终就会实质成为“局部>整体”、整体不再进步(典型如今天改革的现实中,出现了不少大幅增加整体成本、降低整体效率的“局部正确”);一些整体性特征明显的概念则很难被真正理解、落实,比如“体制”(不是某一个制度、政策,而是所有方面共同建构的彼此关联制约的整体性,即 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真正的整体性努力、创新和突破往往还难以被欣赏,因为人们习

惯于从各种局部而非整体结构、元整体结构出发去评判事物。

当然,虽然主要还是在包罗一切的方向上,人居三还是代表着向关于人居问题及其解决的整体理解的进一步逼近,其中也已经出现对“可变”、“整体的特定性”等的自觉(比如可能既出于对分权的偏爱,也因为对不存在统一标准的自觉,强调尊重因地制宜、自主决策的原则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从而体现了人类整体化努力的巨大勇气、付出和成就。

实际上,由于整体性是事物的本性,并不可能因为人对自己的误导而完全消失,所以整体主义规划在实践中其实一直存在。人居40年,在这方面也有非常大的发展,比如由英国开始,一些国家的城市规划转型为“空间发展框架”,国外城市治理的很多实践都是“框架+有限精准的行动项目”,规划编制的具体目标、形式等已经高度灵活而特定化,等等。这些都是突破传统模式、做好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的成功实践。只不过,由于缺乏整体主义的理论自觉,这些非常重要的发展并没有被人居三的核心文件意识到。

“整体”作为事物的基本属性,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基本哲学命题,直接或间接地被人们反复触及过,很多性质也被研究过,其中最系统的研究应该是现代的系统论^[24]。但是,“整体”的本体性或主体价值显然一直没有被意识到,“整体”也从来没有在理论上成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要素。人们始终认为整体是局部之和,尽管意识到“整体>局部之和”,但真正关心的是局部之和如何产生出了“整体”效果;在本体论范畴,人们则反复寻找先验的“局部/原子”或现在常说的基本粒子。意识不到“整体”的主体性,就仍然会陷在各种先验观中,最终不能彻底意识到同时性逻辑、猜想、灵感等意义。也就是,如果先验性、局部才是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抛弃过的基础,想要意识到整体其实是“整体一局部”同时性复合体这样的复杂本质就难上加难。笔者使用“整体主义”术语,是为事物的整体属性、基于此的理论寻找一个恰当名称的结果。文献中,整体主义(Holism)术语被正式使用始于斯玛茨(Smuts)1926年的《整体主义与进化》(Holism and Evolution)^[25],这是一部罕见的以整体为主题的著作^①,尽管作者的观点还是一样的“整体是局部之和”,但他初步意识到了整体似乎具有某种本体性,从而可以统筹事物(matter)、生命(life)和意识(mind)。近年来从另一个角度,人们已经大量意识到了事物的“关系属性”,但仍然没

① 1926年才有Holism一词同样间接证明了人们对整体作为事物的基本属性的轻视乃至熟视无睹——人们总是好像完全理解了“整体”似地在语言中运用着它。

有意识到先验观的问题，学者实际上试图用新的先验概念代替旧的^[26]。国内现实实践和理论中，整体主义术语偶尔出现，含义同上，进而有在此基础上的狭义特指，如集体主义^[27-29]。

笔者整体主义的起点，是意识到可以用同时性逻辑代替线性逻辑，进而可以抛弃无法确证的先验观。在此基础上，意识到一切确定性是由关系、一致性、同时性和整体决定的，进而意识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意识到猜想、灵感对于进步的核心价值，等等。如果一定要说是否有某个始终不变的事物，那么，唯一先验、唯一的本体是关系和整体等整体主义的相关内容。但实际上，这是一套“规则”，一套主观建构世界和世界建构自身的朴素但强有力的工具，整体主义没有先验化任何事物，整体主义自身是一个“自由的纪律”，在这个意义上，人真正实现了自由。

这样的整体主义，将不仅让中国人跨越此刻现实中的路径依赖，而且超越从一套先验范式到另一套的轮回——彻底解放了自己，从而在人类的优秀者已经远远超越了历史的当代，实现我们的不仅超越自己的历史甚至超越人类历史的伟大中国梦。而且，这样的发展并不复杂。当一个天赋聪颖而又勤奋苦干的社会，真正唯真唯实、大胆猜想、小心求证、整体思维，从而掌握了真正的理性的时候，并不需要每个人每次都想得很多并做得很多，人们相互间就可以互补，也会自觉留出更多属于独立思考的空间，彼此间也会有更多的宽容，一个更加和谐、轻松却稳步提升发展的社会就将到来。UPI

特别感谢编辑部的约稿和三位编辑的辛勤劳动与启发。

参考文献

- [1] 孙立平. 当前中国最急迫的三个问题——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Z]. 微信公众号“人民论坛网”(ID: rmltwz), 2016-07-29.
- [2] 王红扬. 整体主义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评《为增长而规划：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 3-15.
- [3] UN General Assembly. New Urban Agenda[C].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ousing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Habitat III), Item 10 of the provisional agenda, 2016-09-29.
- [4] UN-Habitat.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n Urban and Territorial Planning[C]. UN-Habitat, 2015: 2, 8.
- [5] 汪光焘. 贯彻《城乡规划法》，依法编制城乡规划——在全国城市规划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J]. 城市规划, 2008, 1: 9-16.
- [6] 孙忆敏, 赵民. 从《城市规划法》到《城乡规划法》的历时性解读[J]. 上海城市规划, 2008, 2: 55-60.
- [7] 李雪飞, 何流, 张京祥. 基于《城乡规划法》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改革[J]. 规划师, 2009, 8: 71-80.
- [8] 张兵. 新进的规划制度改革面临的出路——关于制定《城乡规划法》的讨论[J]. 城市规划, 2000, 10: 8-13.
- [9] 颜丽杰. 《城乡规划法》之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从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分化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困惑与出路[J]. 城市规划, 2008, 11: 46-50.
- [10] United Nations. The Vancouver Declaration on Human Settlements[C].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1976-06-11.
- [11] United Nations. The Vancouver Action Plan: 64 Recommendations for National Action[C]. Approved at Habita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Vancouver, Canada, 1976.5.31-6.11.
- [12] Aaron Wildavsky. 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J]. Policy Sciences, 1973, 4: 127-153.
- [13] 石楠.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解读人居三《新城市议程》[DB/OL]. 中国城市规划网. (2016-10-19)[2016-12-01].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id=832.
- [14]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人民出版社, 2004: 357-404.
- [15] Klement Kevin. Russell's Logical Atomism[EB/OL].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3. [2017-01-13].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logical-atomism>.
- [16] Ian Proops. Wittgenstein's Logical Atomism[EB/OL].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3. [2017-01-13].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wittgenstein-atomism>.
- [17] 王红扬. 对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J]. 城市规划, 2000, 6: 7-16.
- [18]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19] 王小波. 思维的乐趣[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20] 伯特兰·罗素. 西方的智慧[M].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 [21] Fishman Robert. Urban Utopi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The MIT Press, 1982.
- [22] 大前研一. 低智商社会[M]. 中信出版社, 2010.
- [23] 人民日报. 元旦献词：以自我革命的气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N]. 2017-01-01.
- [24] 路德维希·冯·贝塔兰菲. 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M]. 秋同, 袁嘉新,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 [25] Smuts J C. Holism and Evolution[M]. Gestalt Journal Press, 2013.
- [26] Graham Stephen, Healey Patsy. Relational Concepts of Space and Place: Issues for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9, 5: 623-646.
- [27] 卢风. 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9: 43-62.
- [28] 王宁.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的新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2: 125-132.
- [29] 刘晓虹. 试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整体主义及其在近代的变革[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5: 69-75.

(本文编辑：张祎娴)